余英時英文論著漢譯集

何 俊 编

余英時自題

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

李 彤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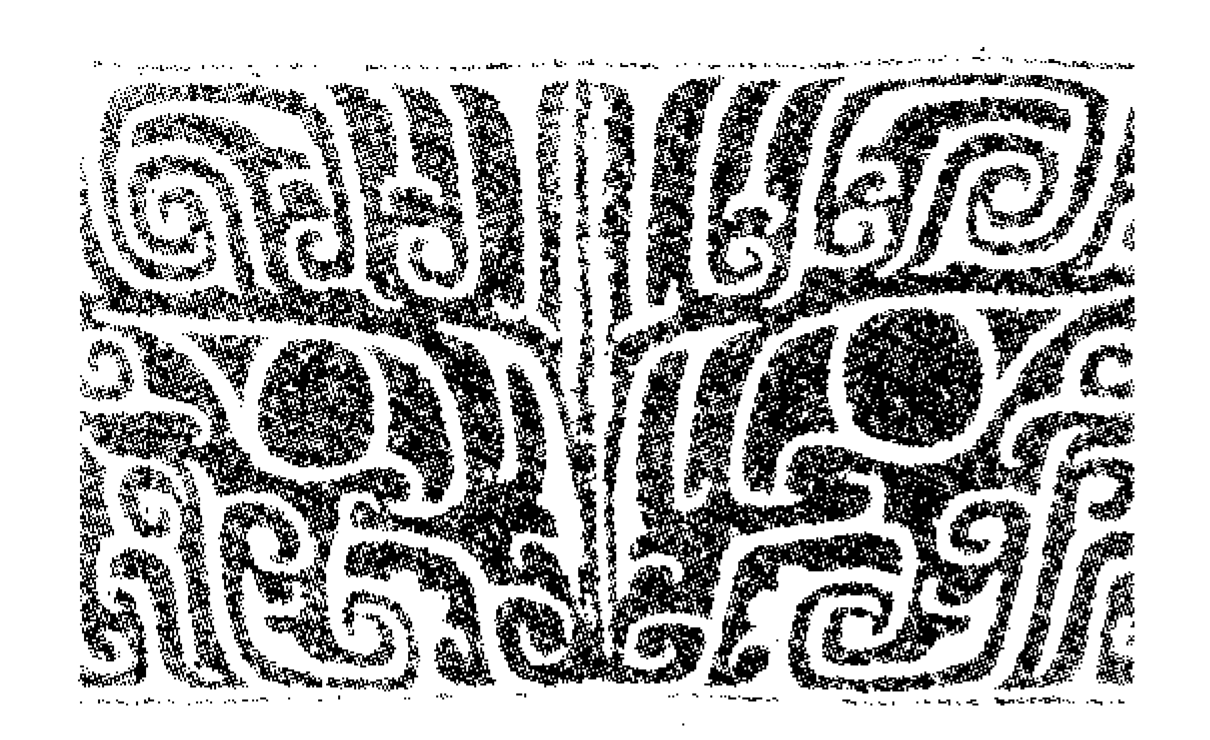
余英时（1930— ） 安徽潜山人。香港新亚书院首届毕业生，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著有中英文论著数十种。

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何俊编）

《东汉生死观》
《汉代贸易与扩张》
《人文与理性的中国》
《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

责任编辑：童力军
美术编辑：何　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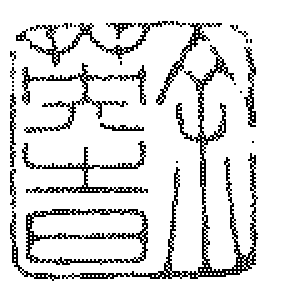
K·611　定价：18.00元
ISBN 7-5325-38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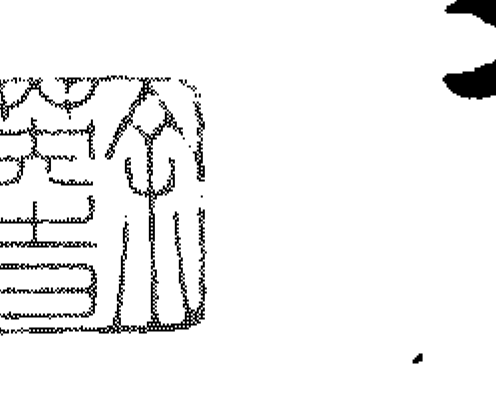


余英時英文論著漢譯集

何俊 编

余英時自題





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

李彤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余英时著;何俊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0

(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丛书;4)

ISBN 7-5325-3820-6

Ⅰ.十… Ⅱ.①余…②何… Ⅲ.史学-中国-文集 Ⅳ.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0709 号

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

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

余英时 著

何 俊 编

李 彤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 @ 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5 $\frac{14}{18}$ 插页 5 字数 88,000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100

ISBN 7-5325-3820-6

K·611 定价:1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公司管理部联系。T:56628900×813

编者序言

何 俊

我收集余英时先生的英文论著，初衷本是为了自己更全面地学习他的治学方法和理解他的论学旨趣。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慢慢觉得，如果能将这些论著译成中文，也许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意义在我看来至少有两点：一是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更全面地读到余先生的论著；二是有助于对海外汉学以及中美学术交流的认识与研究。

《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编为四册。《东汉生死观》取名于余先生1962年在哈佛大学的同名博士论文。由于这篇学位论文中的第一章后经修改以同名发表于1964—1965年的《哈佛亚洲研究学刊》，因此在本册中用后者取代了前者。此外，另收了同一主题的一篇书评（1981年）和一篇论文（1987年）。时隔二十年作者续论这一主题，主要是因为考古的新发现。1978年末余先生率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访问中国月余，汉代文献与遗迹的亲切感受大概也起了激活作用。

《汉代贸易与扩张》取名于余先生1967年出版的同名专著。此外，另收了两篇论文和一篇书评。论文与汉代有关，发表的时间虽然分别是1977年和1990年，但后者是因所收入的文集出版延后所致，实际上它们同时完成于1973—1975年间。与这一主题相关，作者后来为《剑桥中国史》(秦汉卷)(1988年)撰有专章"汉代对外关系"，此书早有中

译本,故这里不再收录。1964年刊行的书评是关于唐代财政体制的,虽与汉代无直接关系,但考虑到主题同属于社会经济史,所以一并编入此册。

《人文与理性的中国》由多篇论文组成,讨论主题集中在中国思想史,涉及3世纪到当代,体裁有专论、书评、条目和序跋,先后发表于1980—2000年。之所以取名为《人文与理性的中国》,是我以为这个提法能反映余先生的思想,他的所有思想史论著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也正是要释证中国文化中的人文情怀和理性精神。

《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取名于余先生作为美国汉代研究访华团团长写成的同名总结报告。此外,收入了由余先生汇总的访问活动与讨论日记,以及差不多同时完成并与主题相关的一篇专论。这篇专论最初以中文写成发表,后被译成英文并经作者适当改写后发表,收入本册时相同部分照录中文,不同部分则据英文而译。

余英时先生的英文论著在1970年代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此后他的学术论著主要是以中文发表,大部分英文论著则概述他中文论著的主要思想,以及他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分析性通论。前者显然是因为他希望更直接地贡献于中国学术,后者则表明他希望将中国的学术引入美国。促成这个变化的契机大概是他1973—1975年在新亚书院及香港中文大学的任职。虽然服务两年后仍回哈佛任教本是事先的约定,且这两年的服务也令他身心疲累,但深藏于他心中的中国感情似乎更被触动,更需要得到合理的安顿。1976年1月余英时先生四十六岁时,同在哈佛任教的杨联陞将自己与胡适的长年往来书信复印本送给他作为生日礼物,在封面上题写:"何必家园柳?灼然狮子儿!"大概正是体会到弟子的心情而示以老师的宽慰、提示与勉励吧。

此后,余先生与两岸三地的中国学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我在余先生小书斋的书架上翻览时曾见到钱锺书在所赠《管锥编》扉页上的题词,当时觉得有趣,便请余先生用他的小复印机复印了一份给我,现不妨抄录在这里,也算是一个佐证。题云:

误字颇多,未能尽校改,印就后自读一过,已觉须补订者二三十处。学无止而知无涯,炳烛见跋,求全自苦,真痴顽老子也。每得君书,感其词翰之妙,来客有解事者,辄出而共赏焉。今晨客过,睹而叹曰:"海外当推独步矣。"应之曰:"即在中原亦岂作第二人想乎!"并告以入语林。

总之,读余英时先生的英文论著应当注意其中的中国学术背景,正如读他的中文论著应该留心其中的西方学术背景一样。

借此我说几句言轻意重的感谢话。感谢余先生对我的信任,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领导张晓敏先生、编辑童力军先生对我的支持,感谢所有的译者对我的帮助,以及对我校改大家译文的理解。还要预先感谢读者对这一汉译集的宽容,因为我认识到翻译的不容易,尤其是翻译汉语文章写得极好且广为人读的余先生的英文论著,所以我常想像到嚼饭与人的感觉。因此除了预先感谢读者的宽容外,我也诚望读者能够得意忘言,尽管不足甚至错误的责任我丝毫不应该也不可能推卸。

最后我想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神学组主任卢龙光教授,他邀我来此任客座教授,使我在教课之余有自由的时间来集中处理这一汉译集的工作,同时也让我得以利用这里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来复核相关文献。还有,我窗外的溪声鸟语、绿树红花,使我孤寂的工作变得活泼泼地。

2004年4月8日

序于香港中文大学神学楼

目　　录

1. 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1981年)

在我们代表团访问期间，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一场统称为“思想解放”的变革，它的正式名称是“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少对中国而言，在我们所访问的各个地方，尤其是在北京，思想界的气氛应该是异常宽松。我无拘无束地和中国学者谈到胡适、钱穆以及其他海外学术界的人物，没有感到对方有任何的不自在或尴尬。我也有机会和一些中学生聊天，他们提出了自己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和伟大舵手的批评意见。这令人想起1978年11月中旬爆发的民主墙运动，它刚好发生在我们离开中国后。回想起来，正值中国步入正确轨道之时，我们访问了这个伟大的国家，这的确是很幸运的。

当然，此次访问的官方性质决定了我们很难深入到中国历史学家的内心世界。而且，因为代表团的重要任务是考察秦汉考古原址，碰到的自然更多的是考古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下文中我将根据“四人帮”倒台后的出版物，以及与中国学者的单独谈话内容，试就近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动向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1.1 反“影射史学”运动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史学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不仅“中国历史中的儒法斗争”的主旋律遭到摈弃，而且对孔

子的批判也降了调。有几次在预料到我会持否定意见的情况下，他们还特地邀请我去评论儒法斗争。如同我们的中国同行现在看到的，在“四人帮”控制下(特别是从1973年到1976年)，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已完全遭到破坏，史实受到全面地、有组织地歪曲和篡改。“四人帮”的“那伙史学家们”对中国历史并无兴趣，他们是用历史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孔子先是与周恩来挂钩，接着是邓小平，最后是华国锋。秦始皇与毛泽东，汉代的吕后和唐代的武则天与江青，法家与“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儒家与部分老一辈革命家，也都划上了等号。因此，“影射史学”一词被用来描述“四人帮”直接影响下所出版的“历史”著作的特征。

反“影射史学”运动几乎在“四人帮”垮台后就立即开始了。据我所知，“影射”一词最早见于1976年10月份那期《历史研究》。自从“文革”后期复刊以来，《历史研究》一直受那伙人牢牢控制。这份专业刊物呈现出非常严重的症状，大多数文章采用影射方式。正如一篇简要评论所批评的：“(那伙人)借古讽今，影射比附，弄虚作假，断章取义。”[①] 在我们访问中国时，这场运动正有声有色地进行着。从私人交谈中，我得知“四人帮”在北京、上海有两个声名狼藉的写作班子，分别以梁效(与“两校”谐音)和罗思鼎(与“螺丝钉”谐音)为名发表文章。有些人对滥用影射史学也负有很大的责任，其中，杨荣国、赵纪彬、周一良、刘大杰尤值关注。

最近一位中国作者披露，“儒法战线的斗争”这一论题最初是由杨荣国提出的，1972年底杨在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红旗》上发表了题为《春秋战国时代思想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从此这个论题被极度引申，以至于“文革”被解释为儒法斗争的延续。[②] 从《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初学集》等早期著作的质量看，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三流的普及

① 见《历史研究》1976年第5期页27评论员文章。丁伟志《“四人帮”是历史科学的敌人》(《历史研究》1978年第6期，页5)一文认为，华国锋将“四人帮”对历史的态度视为“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

② 见华森《帮用史学的始作俑篇》，《学术研究》1978年第2期，页18—23。

者和综合者。没有迹象表明他曾在钻研原著的基础上,从事过专题性研究。1973年他突然近乎神话似的成了国内(乃至于国际)中国史方面最富权威性的人物。在"四人帮"时期,由他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1975年修订版)比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更具正统性和权威性。而且广东、广西、湖北、河南、安徽、北京等许多地方邀请他去群众大会上作反孔演讲。[①] 然而,公允地说,杨后来的一些观点可以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找到渊源。例如,春秋时期"礼"、"法"斗争的问题,孔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代言人和韩非子是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的提法,都出现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一书中。唯一的区别是早期这些论题没有因服务于政治目的而被扭曲到极点,可能因为他强烈反孔和赞成法家,所以"四人帮"选他充当官方史学家。据可靠消息说,他死于1978年,那时他已名声扫地。

赵纪彬与杨荣国不同,他是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在反孔运动中,他尤以他的"发现"出名。他发现了历史上儒法路线斗争的最早证据——孔子在公元前498年杀了少正卯。在《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的专题论文中,他试图大胆地证实最初出现于《荀子·宥坐》中的这个故事。通过多种形式的文献学歪曲和对原文的曲解,他声称已确证"史实":孔子任鲁国司寇时,处死了少正卯,而少正卯是"法家先驱"。还有意思的是,在讨论此问题的众多作者中,赵称赞杨荣国最接近问题的真相。[②] 最近曝光了一些内幕,据说在反孔运动早期,江青和姚文元觉得需要找一个反孔的法家人物,以便全面展开从孔子时代到现代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论题。法家直到战国才出现,时间太晚,无法适应政治需要。赵对少正卯问题的研究恰好填补了"四人帮"政治空论上的缺口。[③] 出于同样目的,1974年赵还修改了他的《论语新探》。正如他在

① 见诸葛计和方式光《且看庐山真面目》,《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页17—25。

② 赵纪彬《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页8—9;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香港:三联书店,1952年),页86—87。

③ 傅孙《评唐晓文的三篇代表作》,《历史研究》1978年第1期,页48—49。

修订本的后记中所讲，他抛弃了较早的看法。以前他认为孔子思想中有“进步”一面，也有“反动”一面。后来他得出结论，孔子思想完全是反动的，所有方面都趋向于“复辟”。[①] 这里，政治上的暗示和赵的评论中与现代的关联，都太明显了，不会被忽略。然而，由于赵的著作总是采用语言和原文分析的形式，所以可能从未得以流行。幸运的是(现在看来是不幸)，他在“四人帮”团伙的青年人中发现了一个叫唐晓文的有力普及者。基于赵的“学术发现”，唐写了许多争鸣文章，借孔子攻击周恩来。例如，他对赵《论语新探》里的一个章节作通俗翻版的文章《孔子是全体人民的教育家?》，显然是把周的教育方针当作活生生的靶子。赵也是由唐于1973年6月引荐给江青的。[②]

周一良是哈佛培养的史学家，专门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他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45年卷八上发表的《中国密教》(“Tantrism in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8, 1945)和《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充分显示了他渊博的学识。我早已得知他投靠了“四人帮”，但直到来中国，才知道他卷入“四人帮”政治中有多深。他是最受江青信赖的主要学术顾问之一和“四人帮”在北京的写作班子(即臭名昭著的梁效)里的重要成员。1974年他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关于诸葛亮的法家路线，另一篇关于柳宗元的《封建论》。[③] 据最近一位作者说，后一篇尤受江青赏识，因为文章正好包含了针对军区司令的信息，即他们必须服从“四人帮”的集中控制。[④] 对诸葛亮的研究也是为“四人帮”的政治需要服务的，他得出的“教训”是：一群人只要遵循“法家路线”，就可以很快创建一个统一帝国，而他指的“法家路线”就是“四人帮”的“革命路线”。[⑤] 显然，在质而不是在量上，周的文章为

① 赵纪彬《论语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页418—419。

② 傅孙《评唐晓文的三篇代表作》，页54。

③ 周一良《诸葛亮和法家路线》(《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页57—66)和《读柳宗元封建论》(《红旗》1974年第2期，页32—39)。

④ 见陈石之《评“四人帮”发言人梁效》，《历史研究》1977年第4期，页7。

⑤ 见田居俭《助帮为虐的诸葛亮研究》，《历史研究》1978年第4期，页11—19。

"影射史学"的兴起做出了独特的贡献。[①]

刘大杰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文革"以前,他一直是受人尊敬的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家。因为借武则天颂扬江青,他犯了影射的错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第二册是以儒法斗争的观点来系统阐释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第二章第二节则全部留给了武则天时代。很大程度上,作者将初唐的文学成就归功于女皇的法家政策,并且在唐代文学史上为她保留了极高的位置。在论述古文运动的第七章里,作者希望采用的理论框架是,"进步的法家"柳宗元(773—819)是运动最重要的领袖,而"保守的儒家"韩愈(768—824)只能被排斥在外。然而有些令人吃惊的是,作者采取歪曲事实的手段,企图证明柳宗元在一些政论文中声讨过周公。在这种情况中,周公无误地是指周恩来。最近,刘大杰的著作作为"影射史学"的典型而受到严厉批判。[②]

反"影射史学"的运动大概要占用中国学者几年时间和精力。为了在中国史领域中开始新的耕耘,必须首先清除关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错误观念,这种观念的影响既深且广。在过去的三年里,关于孔子、荀子、秦始皇、董仲舒、武则天、柳宗元、韩愈、王安石、苏轼、宋江、王夫之等人,发表了大量论文。换言之,中国学者用大量时间只是为了清除"四人帮"时期对中国史学产生的影响。

1.2 "破除禁区"

当我们到达北京时,一个全国性的史学会议刚刚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这是我们所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出现的一个新动向。会上

① 见丁伟志《"四人帮"是历史科学的敌人》(页 5)和徐中玉《从"四人帮"反苏轼谈起》(《中华文史论丛》1978 年 7 月第 7 期,页 25—26)。

② 吴文祺《一本荒谬的文学史》(《中华文史论丛》1978 年 10 月第 7 期,页 229—242)和唐振常《可怜无补费精神》(同上,页 243—271)。

重新讨论了中国古代的分期问题。在10月18日的午餐会上，我们的主人于光远先生告诉我们会上提出了六种不同的分期理论。我们知道分期问题本身并不新鲜，它在五十年代就曾是引起争论的话题。[①]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论，中国古代史的分期取决于奴隶制结束和封建制开始的时代。郭沫若的分期被采用为正统的解释。他认为，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四人帮"认可郭的观点，并非因其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非常符合他们对孔子的解释，他们认为孔子是行将崩溃的奴隶制的捍卫者。在"四人帮"猖獗的时候，不允许其他理论的存在，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也因此成为"禁区"之一。

11月初，当我们回到北京时，《光明日报》(1978年11月18日)简要地报道了此次会议。此次会议由《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战线》两个编辑部共同主办，来自15个省市的86位史学家代表51个教学、科研、出版单位参加了会议。[②] 六种分期理论是：

1. 西周。这个理论为已故范文澜所坚持。此论主要建立在两个论据上：其一，在各种周代文献和青铜铭文中，民、庶民或庶人指的不是奴隶而是平民，包括拥有土地和农具一类私有财产的农民。其二，井田制下各级地主私田分配给农民耕种，这种土地制暗示着封建主义。

2. 春秋时期。郭沫若最早提出此理论，但后来放弃了。他认为转型发生在公元前770年左右，分封制的发展是这一时期的特征。新的土地和税收制度(诸如公元前645年晋国的"爰田"，公元前594年鲁国的"初税亩"和公元前590年从每丘征兵)，以及铁农具的出现也被作为封建制开始的证据。

3. 战国时期。这是郭沫若最后提出的决定性意见，可能这一理论在当今的史学家中拥有更多的支持者。战国时期，铁农具不仅出现了，

---

① 关于这个问题，请见 Cho-yun Hsu, "Early Chinese History: The State of the Fiel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8，卷3(1979年5月)，特别是页454—456。

② 关于此次会议更进一步的报道，见《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页123—130。

而且在北至长城南到长江流域的区域里得到广泛使用，这被视作封建生产方式的主要成分而得以强调。其他的技术进步，如使用畜力耕地、修建灌溉工程和施肥，也认为很重要。以这种观点看来，井田制有些像奴隶制的土地制度，战国时期废除井田制意味着封建制的开始。在上层建筑领域中，转变清楚地反映在官僚政治的改革中。从公元前 426 年（魏）到公元前 316 年（燕），各个诸侯国里都发生了变革。这个理论的一个变体，是将公元前 350 年商君正式废除井田制看成是奴隶时代结束的标志。

4. 秦的统一。据此理论，中国的奴隶时代始于夏代，西周时期达到顶峰，结束于秦的统一，整个战国时代是过渡时期。在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出现、官僚政治的改革运动和井田制的瓦解，导致了公元前 221 年中国完全的封建化。金景芳是这个理论的主要提倡者。[①]

5. 东汉时期。这一派对西汉社会的性质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西汉时期奴隶的数量急剧增加，这是史无前例大规模掠卖奴隶的结果。另一种注意到相对于有权有势的奴隶主家庭，农民也有少量地产。但他们坚持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方面，奴隶制继续占统治地位。总的来说，这一派非常重视东汉光武帝颁布的解放奴婢的诏令，这些诏令构成了中国封建国家的法律基础。

6. 魏晋时期。最后这一派也相信，在汉代政府和私人的大型农工商企业中，奴隶是最主要的劳力。这一派的领袖何兹全主张汉代以后奴隶制才向封建制转化的观点，他分析了魏晋时期的四类社会经济变化：一、城市向自然经济的转移；二、介于奴隶和平民之间的半自由社会群体（如客和部曲）的出现；三、政府和豪族之间竞相控制人口的争斗；四、无土地农民的社会身份由游民向农奴转变。[②] 但在转变的确切时间上，这一派出现了意见分歧。一些人认为是在三国鼎立开始时，另一

① 见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历史研究》1979 年第 2 期，页 48—57；第 3 期，页 50—63。

② 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页 87—96。

些人(包括何兹全)则对比西方的罗马帝国,认为封建制度伴随着西晋的灭亡而产生。

正如中国报导所评论的,会议的重要性不完全在于提出了各种理论的根据,因为大部分讨论是1950年代的继续。在大约中断十二年之后,中国的史学家们在历史分期问题上可以第一次发表不同的看法,这是这次会议的意义所在。[①] 这一禁区的突破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势必产生重要的影响。譬如当我和一位成都的学者讨论这次会议的意义时,他说:"假如中国的封建制并不像过去十年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始于战国时代,而是始于西周,那么所有关于儒法斗争的讨论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事,而且将不得不以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孔子和他的思想。或者如果我们接受产生于东汉或魏晋的假设,那么我们对秦始皇及其政策的成见可能发生戏剧性的改变。"由此我们看到,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随着分期问题的公开化,"影射史学"的基础开始坍塌。[②]

1.3 与历史学家的私人交谈

作为代表团的团长,我个人只有很少时间和精力拜访史学家。不过幸运的是,我还是有机会与一些杰出的史学家进行了私人交谈。

首先是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他是研究中国佛教思想的专家。他研究中国佛教的文集《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初版于1963年。[③] 任先生1930年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念书时,师从汤用彤和熊十力。因为我多少了解一点熊的著作,所以我们便从熊的哲学影响,特别是熊的两位高足唐君毅和牟宗三在港台领导的新儒学运动谈起。从当代新儒家,我们的话题自然转到了宋明理学。在一起简单回顾了西方、港台和日本的理学研究,特别是朱熹和王阳明研究的近况后,我问任先

① 《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页129—130。
② 见刘泽华《砸碎枷锁解放史学》,《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特别是页17—18。
③ 这本书的修订本名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

生，中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们是否会对理学感兴趣。我强调，理学的传统在思考的范畴(categories of thinking)方面，而不是思想的内容(substance of thought)上，其学术力量(intellectual force)远没有丧失。为了说明这点，我向他提了两个重要的事实：首先，一般说来，儒家思想家，特别是理学家，对改造世界要比解释世界总是抱有更多的兴趣。这与马克思所见到的西方哲学传统几乎完全相反。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那么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我相信这是主要的奥秘之一。其次，现代中国人非常强调"专"与"红"的区别，这在理学"道问学"(朱熹)与"尊德性"(陆王学派)的区分中可以找到很深的根源。我希望中国学者能更严肃地对待理学，而不是仅仅在政治上指责它。任先生显然能接受我的非正统观点，虽然他很可能只是出于礼貌。不管怎么说，他让我相信他有编辑理学原著的计划。他特别提到，在这个计划中，王阳明的著作可能在不久后能出版。

在成都，我有机会与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缪钺交谈。我求见缪教授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而且因为他是我以前的老师钱穆教授的老友和杨联陞教授的内兄。和钱穆一样，缪也是一位自学成才者，精通古籍、历史和文学。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他主讲和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的历史。他的著作很多，其中《读史存稿》(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收集了他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论文，《杜牧传》(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的初稿实际完成于1964年。他对杜牧(803—853)这位盛唐诗人做过详细的编年研究，写成了《杜牧年谱》，此书正待出版。

缪将近八十岁，尽管患有白内障，但"四人帮"倒台后，他恢复了活力，坚持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

交谈中，我了解到整个"文革"期间没有学者能够进行任何严肃的研究工作。譬如，虽然教授们全都不教学了，但仍要求参加日常的政治会议，学习"革命文件"。有时甚至要过半夜才回家，实已筋疲力尽。后来我在北京时，从瞿同祖教授那里印证了这一点。瞿教授是"文革"前夕回国的，我问他回国后从事哪项研究，他说几个月前才调入近代史研

究所，他没有机会看一页书。至此才弄清楚，在动乱年代，只有考古工作才允许继续开展，因为考古碰巧满足"四人帮"政治宣传的需要。

我从缪教授那里得知，除四川大学外，还有两个魏晋南北朝研究中心。一个在武汉大学，由唐长孺主持；一个在山东大学，由王仲荦主持。王是《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的作者。为了培养在这一重要领域的年轻学者，三个中心最近重建了研究生点。

11月初，当我们回到北京时，我偶然得知唐长孺教授也在京城工作，我于是要求与他单独会谈。11月15日下午，我们的主人友好地安排了我和唐教授在故宫会面。

唐是前上海光华大学已故吕思勉教授的学生。他的主要著作有：《唐书兵志笺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和《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两本研究魏晋南北朝的专著已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充分肯定。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可能是迫于"四人帮"的压力，他发表了一篇讨论曹操和另外一个人的法家路线的文章，歌颂"历史革命"。所谓"历史革命"，无非是影射史学。[①] 我很想知道"文革"对唐这样优秀的学者究竟干了些什么。

尽管唐的单位是武汉大学，但他已调到北京多年，从事被指派的工作。由他主持的正史标点本已出版。过去几年他主要在编辑新疆吐鲁番发现的唐代文书。他告诉我，这是另一个大项目，已快完工。1960年代初以来，从吐鲁番的各种各样的墓葬中出土了八千多份唐代及更早的文书，包括政府公文、私人文书（如不同种类的契约），以及政府与私人间的文书。最近的研究（包括唐本人的）清楚地表明，他们十分关

① 见唐的《论曹操法家路线的形成》（《历史研究》1975年第1期，页113—119）和《喜谈史学战线的新变化》（同上，1976年第1期，页65—67）。如果缺乏真的确信，我相信唐不可能会写第二篇宣传谬论的文章。

注这一时期的地方行政和社会历史。[①] 我们有希望在二三年内看到他们的出版物。

交谈中，我特地问起他对门阀制度的看法。我这样问是因为我知道他在此领域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1959 年，他发表了有关门阀制度形成与衰落的重要文章。[②] 文章中，他把占田制看成是门阀制度的经济基础，把九品中正制看成是它的政治基础。但据 1962 年底的报道，他完善了他的理论，明确提出门阀制度的经济基础不是土地制度，而是被称为“部曲”或“客”的农奴制。[③] 在我的印象中，1962 年以后，对此问题他没再改变过看法。至于门阀制度的衰落，他仍认同已故陈寅恪的解释，认为隋朝统一后，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削弱了门阀制度的政治基础，7 世纪末武则天反对北方贵族的政策给了它最后的打击。他完全知道有学者长期持另一种观点，认为门阀制度直到唐代结束，或者甚至更晚的时候才崩溃。然而在他看来，所有的证据都有很强的说服力，不可能有别的解释。他倾向于对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门阀制度与个别的“世族”做出重要的区分，后者在 7 世纪以后仍继续存在。

最后，就中外史学家进行合作的可能性问题，我询问了缪钺和唐长孺两位教授。他们都表示赞成，这很令人鼓舞。我分别问他们，假设《剑桥中国史》丛书的编者邀请他们写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那部分，他们是否会考虑接受。他们的反应都是谨慎的，但显然是肯定的。这似乎说明，我们的中国同行变得更为积极，他们进入国际史学家行列中的日子已经到了。

---

① 有关吐鲁番文书的报告见《文物》1972 年第 1 期，页 12—14，79；1973 年第 10 期，页 12—15；1975 年第 7 期，页 12—16。也见唐长孺《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高昌郡县行政制度》，《文物》1978 年第 6 期，页 15—21；胡如雷《几件新疆出土文书中反映的十六国时期租佃契约关系》，同上，页 22—25。

② 见唐长孺《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 年第 8 期，页 1—24。

③《唐长孺对门阀制度的新看法》，《历史研究》1962 年第 6 期，页 176。

1.4 个人的一些观察

正如前部分开始时所说，在代表团访问期间，我与中国史学家的接触非常有限，就好像是奔腾咆哮的黄河巨流中的一滴水珠。当然，即使是河流中跳动的一滴小水珠，它也能反映出目前河流的某些状况。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在结尾部分我冒昧地发表一些个人的评论。

反"影射史学"运动中，不难看出中国历史学家的热诚和严肃，他们把从 1966 年"文革"开始以来就丧失了的理性带回历史研究中。所有迹象表明，中国的史学家已开始重新意识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应该始终保持一段适当的、有利于彼此健康发展的距离。把历史上的孔子和现实联系起来，不仅危害历史学科，而且对于历史所服务的社会事业也是灾难性的，这一点已得到证明。

但是，此项运动仅处于万里长征的开始阶段。多年来的实践使得影射或多或少地成为史学家和普通大众的一种思维习惯，某些历史人物已和某些现代人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需要花时间去消除这种妄加比附的习惯。譬如，当人们读到某些作者批评秦始皇和洪秀全因患老年痴呆或偏执狂而犯错误时，不自觉地会怀疑谁是真正受批判的人。[①] 最近对武则天在初唐的作用进行再评价时，也有一些人倾向归咎于她年老多病的丈夫，并对她淫荡的个人生活提出严厉的批评。[②] 暗示太明显了，用不着解释。

在我看来，影射史学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政治现实和理论中，中国共产党内部派别之争的激烈化使历史成为政治的武器。于是吴晗为彭德怀将军辩护，写了《海瑞罢官》。戚本禹借反对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

① 例如，见刘泽华和王连升《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历史研究》1979 年第 2 期，页 33—47）和王庆成《关于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同上，1978 年第 9 期，页 78—82)。

② 例如，见何汝泉《关于武则天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78 年第 8 期，页 58—71）和熊德基《武则天的真面目》(《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第 1 期，页 159—186)。

投降，攻击刘少奇和所有那些遭国民党逮捕后写“自白书”的党员。无论在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或者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历史被用作党派斗争的武器，显然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正如荷兰历史学家格尔(Pieter Geyl)讲17世纪的西欧：

> 在那些政党分歧凌驾于公众生活之上的国家里——在英国，在荷兰共和国，确实是为了欧洲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斗争的目的——人们翻来覆去地查找历史，以获得支持己方的材料，或怀疑对方过去的所作所为，或败坏对方已故领袖的名声。可以想到，没有一件事后世会不知道；但17世纪党争的政治混战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历史影射、阐释所占的比例，今人看来仍似乎感到惊讶。[1]

当然，如果格尔能活到见识“四人帮”控制下的中国历史被当作武器的情况，他也许一点也不会认为17世纪的事情值得惊奇。

影射史学的思想根源在于古为今用的观念，事实上，前者是由后者的实用方面产生的直接后果。但不幸的是用过头了，步入了歧途。另一方面，也应指出的是，古为今用的观念从1950年代产生以来，就未得到明确的解释。总的来说，为短期的政治目标服务的动机，促使史学家直接选择有用的事实，不可避免地会将历史的学问转变为政治的宣传。“四人帮”控制下的历史革命与美国1960年代新左派激进的史学非常相似，注意到这点很有趣。新左派激进的史学家也搜寻有用的历史，“但其结果既不合用，又违背历史”，费希尔(David Hackett Fischer)的这个评论很恰当。费希尔关于美国新左派激进史学家的看法，同样适用于中国“四人帮”手下的那些“革命”史学家：

> 总有许多史学家，他们更关注真理和他们在一起，而不是他们和真理在一起。这种态度不是任何流派或任何一代人的专利。但

[1] Pieter Geyl,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10—11.

> 无论它出现在历史学术活动的什么地方，其内容都是可恨的，后果都是可怕的。将史学衍变成宣传工具，简直就是在毁灭它。利用史学的问题不解决，就将颠覆史学，因为由此产生的根本就不是历史。……而且，“新左派”史学家现在出产的“有用”的历史不讨人嫌，因为它内容上是激进的，尽管其方法论上极其保守……许多新的好程序设计现在正处在发展过程中——这些设计会更接近于客观现实的理想。但在激进史学中很少看到它们，因为激进史学是印象式的，技术上不复杂，概念上也无原创性——旧概念只在细小的方面得到调整。[①]

唯一的区别是，古为今用的观念在中国遭到如此无情地扭曲，以至于产生了影射史学。

毫无疑问，中国历史学家反“影射史学”是发自真心的。但是只要作为“影射史学”前提的基本意识形态未经检验，就恐怕不能说取得了完全胜利。因为“古为今用”的观念不充分厘清，就很容易导致用过去比附现在的谬误，而“影射史学”只不过是其表现形式之一而已，虽然可能是最恶劣的一种。

“突破禁区”是中国史学领域里另一个很有意义的新动向。在此方面我们已看到，重新开展分期问题的讨论已付出了较大的努力。在我们回到美国以后，又有一些甚至有时令人惊讶的进展，它们清楚地表明历史研究中的禁区正被解除。例如，在近期的《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0期)上，发表了已故胡适的有关《水经注》的一小篇遗稿。这是一个进步，因为这在“文革”中是不可能的，甚至在1966年以前也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历史研究中“突破禁区”的运动会面临两个直接的问题。一个是怎样消除历史学家头脑中存在的疑虑，甚至是对可能产生的后果

① David Hackett Fischer, *Historians' Fallacies: 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70), p.314.

的担心。对这“思想解放”的第一步,我所接触过的所有学者都充满热情,但当他们进一步谈到乐意去把握这一机会时,有些人无意中流露出内心的疑虑。虽然最近的报纸和刊物在不断地勉励知识分子要战胜尚存的畏惧,勇敢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如果今天中国大多数史学家仍未准备破釜沉舟,我不会感到奇怪。在中国一个月的旅程中,我发现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虽然在十年“文革”中受尽屈辱和迫害,但实际上早在 1957 年“百花齐放”运动突然转向反右斗争时,他们的锐气便已被消磨殆尽了。通向信任的桥梁还有待铺设。

另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尽管出现了“科学是没有禁区的”的新口号,[①] 但如果以为中国的史学家现在可以自由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基本理论提出质疑,则不免显得过于天真。正如中国古代分期问题的讨论所充分显示的,六种方案都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化论为基础的。以我的偏见,它们根本不是六种不同的“花”,而只是同一种花开放在不同的时间里。就这个专门的问题讲,我甚至不敢确信马克思是否是同一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否会认为他的社会进化论是适用于所有历史社会的普遍模式,毕竟他的理论是建立在研究西欧发展的基础上的。1877 年,当他的一个追随者试图将他的理论应用于俄国时,马克思强烈反对这一做法。在《答米开洛夫斯基书》中,马克思以这样的言辞谈到这位狂热的追随者:“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给我过多的羞辱)。”[②]人们不禁要怀疑,如果马克思能活着看到人们正以各种方式把他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历史中,不知他将作何反响。

10 月 19 日,在北京大学与中国史学家会见时,长春会议分期的问

---

① 柳树滋《科学研究要敢于冲破禁区》,《红旗》1979 年第 3 期,页 49—53。

② K. Marx & F. Engels, *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Lewis S. Feuer ed. (New York: Doubleday, 1959), pp. 440—441.

题也成了我们的话题。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只要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基础，中国的史学家便可以自由地提出任何分期的方案。好像马克思主义原理已成为怀特海(A.N. Whitehead) 所说的存于每个时代哲学里的“基本设想”，它“似乎很平淡无奇，以至于人们不知道在用它，因为他们从未考虑采用其他的方式”。[1]当然，根本的不同是在于：怀特海所谓的“基本设想”是被一个时代的人们无意识地接受的，而马克思主义原理则是中国史学家有意识地接受的。在史学领域“突破禁区”的运动中，恐怕是不可能超出马克思主义界线的。但这样说并不是贬低这项运动的重要性。随着“文革”期间强加在学者身上的所有束缚的解除，中国历史研究将很快回复到 1950 年代后期和 1960 年代初所达到的高水平。除了它的理论局限，“突破禁区”的运动已使历史学家对史实进行客观分析成为可能，不用再担心会犯政治错误。

最后，作为文章的结束，我想谈谈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人才严重短缺的问题。“文革”前最活跃的那些史学家不是已经去世，就是已七八十岁高龄了，而且一般来说身体很差。除了极个别外，他们不再可能有多少新的研究。确实也还有年轻一点的一流学者，年龄从四十、五十到六十岁。但似乎他们的人数有限，而面对的任务却是巨大的，因为最近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文书。“文革”使大学教育中断了十多年，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史学家在当今中国可谓凤毛麟角。最近一些大学和研究所才开始培养研究生，新一代史学工作者的产生至少需要五年时间。而且北京一位资深的历史学家告诉我，如今天赋较高的青年男女一般都被吸引去搞自然科学而不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当然，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普遍的现象，但这无疑将使中国解决历史研究领域的人才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

① Alfred North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Free Press, paperback ed., 1967), p.48.

（据"Chinese History at the Crossroads," in Ying-Shih Yu, ed., *Early Chinese Histo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port of the Han Dynasty Studies Delegation October-November* 1978. Seattl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1, pp.3-18 译出。）

2. 活动和讨论日记(1981 年)

10 月 15 日,星期日,成田

代表团全体成员在东京成田国际机场的王子饭店集合。

饭后我们开了一个短会,重温了旅行路线,并各自准备对原要求可能被我们的主人修改时进行协商。每个人都急切地想去敦煌,不仅因为它是著名的佛教艺术宝窟,也因为它在汉代扩张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最后我们一致同意,如果我们不得不放弃一些地方,那么将放弃南京、昆明和济宁。我们讨论了与汉代研究各个领域的中国学者单独接触的问题。

10 月 16 日,星期一,成田—北京

我们刚过中午就离开成田,下午 3:40 准时到达北京机场。主要由我们的邀请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的欢迎组在机场迎接我们。成员包括社科院书记刘仰侨先生,外事办主任唐恺先生,历史所副所长尹达先生,考古所副所长王仲殊先生,世界宗教所翻译吴运贵先生,历史所副所长林甘泉先生,外事办工作人员金至洪先生,外事办翻译王黎明先生和中国旅行社翻译薛焕辉女士。最后四人将全程陪同我们。在机场

迎接的还有文物保护局分管对外关系的负责人郭劳为先生，以及代表团成员罗伊(David T. Roy)的兄弟、主管此事的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罗伊(Stapleton Roy)先生。

未经严格的海关和入境检查，我们马上被领进接待室。简要地相互介绍后，我们乘坐六辆中国制造的上海牌轿车驶往北京饭店，入住八楼东面的房间里。房间很不够，所以除了代表团团长(余英时)和唯一的女成员布格(Patricia Berger)外，其他人均两人一间。安顿下来后，东道主和我们开了个会，商量旅行路线，我们欣喜地得知，除了济宁外，其他要求都得到批准。东道主认为我们的行程已非常紧凑，济宁又不在主要的航空线上，并且在它附近我们想去参观的历史景点曲阜孔庙仍在维修，所以有必要取消济宁。我们的东道主非常客气地说："济宁留待下次吧。"他讲得很有道理。事实上，能去敦煌的消息已使我们沉浸在狂喜之中，济宁取消已无暇顾及。我们事先并没有意识到那时敦煌尚未正式向外国参观团开放。包括在兰州等飞机，我们在那里前后至少呆了一个星期。

才到北京，我们已开始感受到真诚的热情，东道主中国社科院全心全意要让她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在中国的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10月17日，星期二，北京

早上我们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这是一座宏大的建筑，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建于1959年，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广场西面的人民大会堂正对着博物馆，也是十大建筑之一。博物馆大致平分为通史和党史两部分。每部分有二百多职工，有各自的展览部、保管部和研究部。博物馆星期二至星期天开放，每天开放时间是8:30到5:30。据说平均每天有二三千人参观。门票为五分，团体参观可以免费。

博物馆副馆长陈乔先生，通史展览办公室副主任任常泰先生，群众

事务办公室讲解组组长齐吉祥先生会见了我们。齐先生为我们介绍了博物馆,接着他和他的同事带我们参观了整个展览。

博物馆的基本宗旨是普及群众的历史知识。展览采用马克思主义的进化模式,将中国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几个阶段。展览是出色的,展品也是顶尖级别的,比如青铜器、早期书写遗迹、农具、武器、坟墓中的雕像、石刻、漆器等等。因为是综合展览,偶尔会发现一些有特别意义的复制品夹在原件中。因此参观者必须看标签,并边走边问。博物馆也拥有特权从地方博物馆借调展品,特别是最新发现的。例如正在展出的展品中,有从秦始皇(前221—前210在位)墓附近出土的实物般大小的兵马俑,有来自咸阳杨家湾的一组墓画,有来自马王堆的织品和漆器,有来自山东临沂的竹简,有出土于西安灞桥、公元前206年至公元8年之间的西汉纸张。一个有趣的特点是,适当地用加以标识的历史文献来充实展览,为某些发现提供文字证据。东汉石刻版印也被用于说明工具的使用方法。

总的来说,展览代表了中国考古学的最新成就。然而,中国的思想世界没能反映在展览中。我们中的一些人不久就注意到孔子仍被当作反面人物和首要反动分子,虽然加在他身上的罪名已被取消。中国近期出版的期刊、报纸,孔子被重新评价,甚至恢复了对他的一些肯定。

我们最后匆忙浏览了一个有关磁州陶瓷器的专门展览。磁州位于河北省邯郸地区。在宋代,磁州陶瓷很有名,并代表着北方的传统。部分展品是从私人那儿借来的,其中包括属于上海秦先生的几件陶瓷器。

下午我们参观了考古所。考古所坐落在一个漂亮的院内,院里有花园,有假山。我们受到所长兼《考古学报》主编夏鼐博士和他的同事的接待。我们被带到接待室进行讨论。出席会议的考古所成员有:副所长王仲殊先生,第一研究室主任、《考古》杂志主编安志敏先生,第一研究室副主任石兴邦先生和佟柱沉先生,第三研究室主任苏秉琦先生、第三研究室副主任徐苹芳先生,编辑室主任卢兆荫先生,编辑室副主任

黄展岳先生，资料员王世民先生，秘书张子民先生，绘图员张广立先生。研究所分为三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专攻新石器时代，第二研究室专攻夏、商、周，第三研究室专攻汉至唐。它的三个田间站分别在安阳、洛阳和西安。

夏鼐博士为我们概括介绍了中国的考古学，其他考古学家作了一些补充。会议在相互提问和回答中结束。会后我们被带去参观工作中的小型考古博物馆、化学实验室、碳 14 实验室。我们离开前照了几张相。

从考古所出来，我们直接去了美国联络处主任伍德考克（Leonard Woodcock）的官邸。因为伍德考克先生正在美国，罗伊（Stapleton Roy）先生代行其职，他和妻子主持了招待会，联络处的几个工作人员和一些中国客人参加了招待会，中国客人有刘仰侨先生和夏鼐先生。

晚上，我们被带去看天桥剧院的歌舞表演。

10 月 18 日，星期三，北京

整天时间和云梦竹简研究小组、马王堆帛书研究小组以及临沂汉简研究小组进行讨论。

早上，我们和研究小组开了一个讨论会，讨论 1975 年 12 月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竹简。会议由尹达担任主席。中方与会者包括历史所研究室主任张政烺，历史所研究室副主任李学勤，历史所研究员 Chang Chieh-fu，四川博物馆研究员于豪亮，法学所研究员高恒、刘海年，以及近代史所研究员瞿同祖。

从 1975 年末到 1976 年初，在睡虎地同时发掘了十二个秦墓，时间从战国晚期（前 403—前 221）到秦统一（前 221）。在十二个墓中，11 号墓里出土了 1,100 余支竹简。[①] 其余的除 4 号墓外，都没有保留文字材

---

① 见《文物》1976 年第 6 期，页 1—10。

料。4号墓里发现的两支竹简被确定为驻守淮阳的两名军官之间的通信。[①] 11号墓的竹简是和墓主一起埋入棺内的。根据已公布的初步报告,[②] 这些竹简分为六类:

1. 公元前227年,南指挥部一位名叫腾的管理者发出的一封官方文书。

2. 公元前306—前217年间的一份大事编年记。[③]

3. 有关秦代法律的三份文件。

4. 秦的判决案例。

5. 一本官方手册,现名为《为吏之道》。

6. 占卜文。

11号墓主被确定为叫喜,姓氏不可考。根据中国方面的估计,他可能死于公元前217年,死时46岁。除了第6种,全部竹简都已发表于《文物》。[④]

在上午的会上,李学勤先生对云梦简作了一个清楚的说明,基本上与发表的材料一致。但披露了某些有趣的细节。首先,法律文件已被重新分类如下:

1. 秦律提要涉及财政、税收、地制、产业等。

2. 秦行政法规中的专章,如《效》,涉及检查官府的货物和供应,如检查粮食供应。

3. 从秦律中抽出来的各种注释,涉及劳役和兵役。

4. 有关刑罚条例的问答,诸如偷盗和杀人,有时有详细的解释。

因此,现在的四分法取代了最初的三分法。其次,李学勤没有提到原先司法判决的第4类。取而代之,李学勤介绍了"封诊式"这一新种

---

① 《文物》1976年第9期,页51—61。

② 《文物》1976年第5期,页1—6。

③ 这个编年记,虽然很简略,但将它和《史记》对照,则极有价值。见黄盛璋《云梦秦简编年记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页1—22。

④ 《文物》1976年第6期,页11—14;1976年第7期,页1—10;1976年第8期,页27—37。

类,它由秦法律文件的两种形式"封"(密封的报告)与"诊"(检查报告)组成。[1] 再次,在占卜文中,发现了一份秦楚对照的日历表。两国所用月份的名称也被给出。最后,竹简的准确数是1,157支,加上80支残损的竹简。

李学勤也报告了云梦简的两种注释版本已准备出版。普及本(不包括占卜文)已在印刷中,精装全本包括占卜文和插图,也将在1979年以后出版。

下午,游览了琉璃厂商业区,那里遍布以传统艺术和艺术家闻名的商店。在那里,我们遇见了马王堆帛书和临沂汉简研究组的成员,包括张政烺先生、李学勤先生,故宫博物院的顾铁符先生,北京大学的朱德熙先生、裘锡圭先生,以及历史所的马雍先生。美国方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杜维明先生加入我们的行列,此时他正随美国海洋学代表团来到北京。

顾铁符先生概括介绍了马王堆帛书,其他学者作了补充,如李学勤谈了医书,马雍谈了史书。这些介绍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先前出版的有关帛书的报道。[2] 为了说明中国学者所作评述的重要性,有必要介绍每种被讨论的文献的历史背景。其中,《老子》、《经法》的手稿很有名,不必再提了。

1.《易经》。据我们所知,帛书《易经》与现在的版本有相当的差异。例如,六十四卦没有被分成两部分,而且它们的排列也完全不同。《系辞》也是不分的一个部分。而且,传部分的《彖辞》、《象辞》和《文言》全都没有,而在现行的版本中这些注释都加上了图解。就此而言,帛书更接近熹平年间(172—177)的石刻本。此本以汉初田何所传为基础。更重要的是发现了《易说》,除了少量合入现行版本的《系辞》外,其余的已散佚了二千多年。最初的报告说,《易说》由三章组成,第一章标题为

① 这可能指那些通常以"爰书"开头的法律文件,见《文物》,1976年第8期,页34—37。
② 见《文物》1974年第9期,页40—44;《考古》,1975年第10期,页48—55。

《要》,第三章标题为《昭力》(一个人的名字),此章最长,共6,000字。贯穿《易说》的是孔子与弟子(比如子贡)的问答,或《易经》传播者与昭力、缪和、吕昌,以及其他不确定者的问答。现在,根据顾先生的报告,《易说》分为三部分可能是错误的,它实际上是由十几个小部分组成。顾先生也将《易说》称为《二三子问》。由于原文不能拿来验证,在马王堆全部资料的最后版本出版前,不可能对此难题下结论。

2.《乐正子》。在帛书《老子甲》的末尾,我们发现了一长段儒家文献(约5,400字),它被分成十七个部分。[1] 原文包括两部分,"经"和"说"或者"解"。"经"的部分是完整的。"说"的部分帛书腐烂程度很大。《乐正子》暂定为战国作品,帛书抄写于前207—前195年间。可能因为当时流行的批孔氛围,原文虽被发现和誊写,但未获当初帛书《老子乙》中发现黄老四篇时的那种关注。迄今为止,只发表了一篇与此有关的论文。[2] 顾先生告诉我们,这段儒家文献最初被认为是世子或子思早已散佚的作品中的一部分,两者都列于《汉书·艺文志》。

但顾先生归纳说,对于原文的最后处理,学者们现在已达成一致,即把它和《乐正子》视为一部书。这很有意义。在《韩非子·显学》里,乐正子被作为儒家八派的创始人之一而提到,但他的确认一直是个问题。传统上,学者们倾向于将乐正子和孔子或曾参的学生乐正子春视为一人。郭沫若则提出乐正子和孟子的弟子乐正克是同一个人(《十批判书》,第3章)。还有,据《荀子·非十二子》,荀子和孟子发展了儒家的五行理论。但荀子(大约前300—前237)并没有透露有关这个理论本身的任何事。几个世纪以来,注释者对这一论述都感到迷惑不解。一些人将孟子的五行和五常视为一回事(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但证据不能令人信服。《乐正子》为这个旧问题提供了一些新视野,因为在许多方面,在观念和语言上,它与孟子的作品都相同,很明显它是思孟学

---

① 见《马王堆帛书》第1册,文物出版社,1974年9月。

② 见庞朴《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一的初步研究》,《文物》1977年第10期,页63—69。

派在后世的发展。根据这段新发现的原文,我们有理由确信,孟子的五行理论最初由仁、义、礼、智、圣构成。在孟子原文(《尽心下》)的一个关键段落中,"圣人"一词未得到很好的解释,现在可以读为"圣"。从朱熹(1130—1200)起就一直困扰着学者的这个"人"字,极有可能是由汉代的注释者窜入的。《乐正子》代表了孟子的五行传统,这没有太多疑问。只是中国学者主要根据郭沫若的解释,将它的作者定为乐正高,却没有来自帛书的足够内证。[①]

3.《五星占》。最初约6,000字的占星学无题论文,现在被命名为《五星占》。论文有一个大事年表形式的附录,时间始于秦始皇当秦王时(前246),止于汉文帝三年(前177)。可能是基于实际的观测,表里记录了木星、土星、金星三颗行星位置变化的情况。[②] 公元前370年到公元前270年这一个世纪里,出现了甘德《天文占星》和石申《天文》这两部重要的占星学著作,但它们已散佚了很久,只有一些片断被后世作品引用。帛书中的一些段落几乎与甘德著作中的一些片断完全一致。而且,甘德据记载是楚地人,因此帛书很可能遵循甘德占星学的传统。[③] 顾先生的报告使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即在大事年表里秦二世政权的年号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陈涉张楚政权的称号。事实上,这一点自从它被发现以来一直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此发现首次证实了张楚确实被陈涉用为政权的称号,在他起义后,随即在楚地建立了此政权。一些学者持相反的看法,如张舜徽认为张楚并不是一个称号。[④] 然而很难判断大事年表中的这个称号在什么范围内被接受、

---

① 后来我们知道,唐兰先生也主张这样解释。但是,根据岛森哲男的最近研究,这一儒家文献在衍生出《中庸》的过程中,也受到荀子的影响。岛森哲男由此认为它是荀子访问齐国后由当地学者写成的。见《马王堆出土儒家古佚书考》,《东方学》第56期,1978年7月,页17—36。

② 另外两颗水星和火星没有记录在内。大事年表发表在《文物》1974年第11期,页37—39。

③ 见刘云友《中国天文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五行占〉》,《文物》1974年第11期,页28—30。

④ 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233—234。

被认为有政治意义。因为陈涉起义发生在秦二世执政的元年(前209),而大事年表是基于楚地对行星活动的观测,很可能事件记录时,占星家们实际上是在张楚统治下工作的。

4.《天文气象杂占》。这是另外一部关于占星的帛书。帛书发现时裂成几十块。和同一墓穴中发现的帛书《刑德》一样,这本书被归入阴阳兵家类,即军事思想里的阴阳学派。书中有图约二百五十幅。可能也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的问题,这一文献和其他阴阳五行方面的仍未出版。顾先生自己在做其他工作的同时,也研究这本占星书。他在最近的《文物》上,① 对此书作了一个概述。论文将这本书中的星象主要分为四类:(1)云;(2)气,包括蜃景、光环和虹;(3)星;(4)彗星。在席泽宗先生的初步研究中,二十九幅彗星图的科学价值得到强调。② 以内证为基础,顾、席两人认为这本书是楚地的作品,出现的时间可能是战国晚期。如是真的话,可以把它当作楚国对自然现象特别有兴趣的又一个证据。在《楚辞·天问》和其他战国时代的资料里,这种兴趣有所表现。

5.《相马经》。这一有关相马的帛书约有5,200字,起初无标题。现暂名为《相马经》,发表于《文物》1977年第8期。③ 帛书中存在一些抄写错误,而且由于原文约有500字受损,其中三分之二不能复原。解释工作初步进行。例如,谢成侠的论文《关于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的探讨》认为,帛书提到伯乐这位古代中国最著名的相马专家。④ 但马王堆帛书研究组整理出版的帛书未发现伯乐的名字。显然,谢对帛书的解读有所不同。如果谢是正确的话,那么会有一个问题:帛书与《隋书·经籍志》中归于伯乐名下的《相马经》是否有某种关系?《相马经》出版后,研究组对原稿的解读也一定作了修改,因为顾先生告诉我们,原

① 见《文物》1978年第2期,页1—4。

② 见《马王堆帛书中的彗星图》,《文物》1978年第2期,页5—9。

③《文物》1977年第8期,页17—22。

④《文物》1977年第8期,页23。

文不是单部作品，而是有三个独立的部分：一篇论文，一篇注释和第二篇论文。无论如何，此帛书是迄今为止这一学科最早的文献，比贾思勰《齐民要术》中有关相马的论述早六个多世纪。

6. 医书。李学勤先生报告了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医学著作，其中有四篇写在竹简和木简上。李先生简要探讨了其中比较重要的几篇，研究组暂名为《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养生方》和《杂疗方》。值得注意的是，前五篇发表在《文物》1975 年第 6 期[①] 和 1975 年第 9 期[②]。两篇《灸经》涉及灸术“脉”，《脉法》、《阴阳脉死候》涉及诊断。最长的那篇医学著作《五十二病方》，实际上开列了 270 个药方，治疗 52 种伤病。以伤科开头，特别谈到金属造成的伤，这很符合主人的军官职业。李先生也提到，和药方在一起的还有咒语。《养生方》由 30 个药方组成，有目录和单独的标记。按李先生的看法，药酒在其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似乎有理由相信，这些以“养生”为目的的药方与《导引图》、《却谷食气》等残篇，都和汉代有关长生不死的仙人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③] 最后，李先生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从《黄帝内经》起，十二脉的观念已成为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为什么在这些早期的医书中，只给出了十一脉。李先生给出两个解释：首先，最初试图用数字十一与“五脏六腑”的总数对应；其次，因为帛书比《黄帝内经》早，阴阳学派的影响还没有大到可以要求六阴脉与六阳脉相配合。那个漏掉的脉，是手臂上的阴脉。

7. 战国纵横家书。马雍先生介绍了历史文献。有关战国的文献已出版两次，首次是题为《别本战国策》发表于《文物》[④]，接着以书的形式题为《战国纵横家书》出版（文物出版社，1976 年）。马先生说，研究组后来认为以“战国策”为题宜引起误解，于是决定采用《战国纵横家

① 《文物》1975 年第 6 期，页 1—5。
② 《文物》1975 年第 9 期，页 35—48。
③ 见《文物》1975 年第 6 期上有关《导引图》和《却谷食气》的两篇论文，页 6—15。
④ 《文物》1975 年第 4 期，页 14—26。

书》这个新标题。这部著作共二十七章，材料几乎与苏秦的活动有关。第四章是苏秦写给燕王的信，这是最重要的一章。据此，《史记》和《战国策》中的许多错误可以得到更正，苏秦的政治生涯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也由此可见。苏秦是活动于齐国朝廷的燕国间谍。虽然他的真实身份暴露后被齐王处死，但他为公元前284年燕国联合其他国家沉重打击齐国铺平了道路。第二十五章披露了公元前218年李园被楚国春申君逐驱后所发生的不为人知的事情。长期以来，有关春申君的历史一直被怀疑，一些学者(西方主要是马斯伯乐[Henri Maspero]甚至认为他是一个编造出来的人物。随着帛书的发现，可以说整个事情一下子就解决了。

8.《春秋事语》。这部帛书有十六章，受到一些损坏，特别是前半部。[①] 书中所记录的大多数历史事件可以在《春秋三传》中看到。有关燕国的第二章虽然很短，但披露了一些全新的东西。整个书证明了《左传》作为一部先秦历史著作的真实性，推翻了今文经学家(特别是康有为)曾一度占统治地位的认为《左传》是刘歆为了迎合王莽(9—23年在位)篡权而伪造的观点。帛书中有一处(即第八章)与《穀梁传》的内容和语言都非常接近。[②]

从马王堆出土的地图、图画和图表中，我们也得知更多的细节。马王堆共发现三幅地图，其中只发表了两幅。[③] 第三幅遭损坏而不能复原，保存下来的仅是原图的十分之一。它被认为是一幅城防图，图上明显地标示出了一处城门和一条护城河。北京的学者不打算出版这幅地图的残片，他们似乎不知道长沙的湖南省博物馆正计划做这件事，这是我们在后来的行程中了解到的。

在马王堆的资料中，有许多示意图在已发表的报告中未作描述。

① 见《文物》1977年第1期，页32—35。

② 对于这部著作的概述，见张政烺的《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5年第4期，页36—39。

③ 见《文物》1975年第2期，页35—48；1976年第1期，页18—22。

有一幅示意图说明按照葬礼的等级,不同的亲属应穿不同的丧服。这幅示意图基本上和《礼记·丧服》的叙述一致。最后是被定名为《伊尹九主》的文献,它以九幅肖像说明九类君主。[1]

裘锡圭先生报告了山东临沂银雀山两个西汉墓出土的竹简情况。这两个墓发掘于1972年4月,出土了许多古代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孙膑兵法》(《齐孙子》)。部分原因是由于田野工作者没有经验,竹简未得到很好的处理,许多裂成了小块。[2] 著作中没有一部有书名,但章节的标题可在《吴孙子》中发现。通过与现存书籍和文献目录勘比,检查竹简的内容,完成了所有的鉴定工作。借助二号墓出土的公元前134年的日期,将两个墓的时间定为汉武帝早期(前141—前87)。

裘先生将银雀山出土的古代著作分为三类:

1. 流传于后世的著作,如《晏子》、《尉缭子》、《六韬》和《逸周书》的一章《王佩》。

2. 没有流传,但早期文献目录(特别是《汉书·艺文志》)中有的著作,包括《齐孙子》和《地典》(地典是一个人名,可能是传说中黄帝宫廷里七辅佐之一)。

3. 没有流传,也没有记录的著作。

这种分类想必未被很快接受,因为交叉的情况确实存在。如《吴孙子》中有的章节没有被流传和记录,而《六韬》流传下来的文本不如所发现的版本完整。

三类著作也许能被进一步分为四类:

1. 军事论文;

2. 政治论文,如《守法》和《守令》;

3. 阴阳和占卜书;

4. 其余文献,包括《相狗方》、《造酱法》、《唐勒赋》(可能是宋玉的

---

① 见《文物》1974年第11期,页21—27。

② 见罗福颐《临沂汉简概述》,《文物》1974年第2期,页32—35。

赋）。

涉及土地制度（《田法》）、市场制度（《市法》）和仓库制度（《库法》）的各种先秦法律也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进一步得知田法是总括性的，田法中特别提到爰田（或辕田）制度，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因为对于制度史学家来说，“爰田”长期是个谜。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前4世纪时商君将辕田制度引入秦国。据注释者认为，这个制度和《食货志》中的“易田”是同一个制度。也就是说，当人们从政府那里获得等级较差的土地时，他们能得到额外的土地分配，以便每年交替耕种，让部分土地休耕。但这个词也出现在更早的材料里，如《左传》中的意思就有所不同。银雀山的全部竹简即将出版，我们希望竹简的出版能对这个问题做出新的解释。

根据裘先生和研究组其他成员的意见，银雀山的发现也为研究先秦著作的文献演变提供了最有可能的线索。例如，竹简中包括“兵令”的六章，与现行版本的《尉缭子》一致。然而，“兵令”一章在捆绑方式和书法上与其他五章明显不同，所以它不可能是《尉缭子》最早的部分。[①]另一方面，“兵令”似乎从属于一部最初包括“守令”和“守法”章节的著作。但“守令”、“守法”两章又与《墨子》中有关城市防御的部分章节相同。有关先秦著作的文献关系的整个问题由此全面揭开。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王兵》与《管子》的部分段落相同。[②] 正如研究组几个成员向我们解释的，《王兵》和《管子》出自一个共同的资料来源，或者《王兵》是部分《管子》文献的祖本。

临沂简也能促使我们这些现代的激进怀疑者更正对现存古书真实性的怀疑。《尉缭子》、《六韬》和《管子》的许多部分都被现代学者当作秦以后的伪作而弃置一旁。因为从刘邦到刘彻，没有一个西汉皇帝的名字出现在这些竹简上，故有理由推测这些文本在汉代建立前就已被

① 见《文物》1977年第2期、第3期。
② 见《文物》1976年第6期。

抄写。[1] 换言之,它们不可能被解释为秦以后的作品。

最后,研究小组稍微修正了关于孙膑文献的看法。文献的第二部分现在被认为是一部散佚已久的军事思想著作,而不是《孙膑兵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会议在下午 5:00 结束。从知识上讲,这是我们在中国一个月行程中最使人兴奋、最有收获的一天。整个讨论中,没有一句无关的空话。虽然发言的相当部分可以从已发表的报告中见到,但这仍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历,由此我们了解到中国一流学者从这些新出土的文献中所得到的发现。我们代表团的一位成员恰如其分地评价道:"就像是亲临现场一样。"

晚上,中国社科院在北京饭店设宴款待代表团,宴会由副院长于光远先生主持。来宾中有社科院的刘仰侨、唐恺、夏鼐、王仲殊、尹达和林甘泉,美国联络处的罗伊夫妇也应邀参加。

10月19日,星期四,北京

早上我们访问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坐落于前燕京大学的美丽校址。我们首先与行政人员和教师们开了一个会。北京大学出席会议的有校长办公室负责人倪孟雄先生,外事办的赵恩普先生、李音九(音译)先生,西语系教授朱光潜先生,中文系教授王力先生和阴法鲁先生,中文系讲师周强先生,历史系讲师张传玺先生和俞伟超先生,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先生等。赵恩普先生报告了学校的院系构成和近期任务。

大会之后,我们根据学科分为小组。比伦斯坦(Hans Bielenstein)、张光直、杜尔(Jack Dull)、黎格(Jeffrey Riegel)和余英时到历史组,布德(Derk Bodde)、梅侨(John Major)到哲学组。代表团里唯一的艺术史家布格(Patricia Berger)与专攻美学的朱光潜教授交谈。

① 见何法周《尉缭子初探》,《文物》1977 年第 2 期,页 28—34。

历史系有中国史、世界史、欧洲史、亚洲史和非洲史方向。中国史又细分为鸦片战争以前的古代史，鸦片战争到 1949 年的近代史，1949 年到现在的当代史。系里有 120 名教职员工和 300 个学生。古代汉语是中国史专业的必修课。学生必须在头两年半里学习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在后一年半里专攻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就古代史而言，进一步开设的专业选修课有商周、秦汉、南北朝、隋唐等等。目前不要求高年级学生写论文。在讨论中，提问和回答都是一般性的。

在哲学系，四年制的最后两年，学生用于专业学习。新的教学用书正在准备中，很快就会出版。原始资料将尽可能地用于学习中，中国哲学的选修课也将增多。在汉代的哲学研究中，重点放在了诸如王充的《论衡》和《盐铁论》等著作上，因为它们被解释为“唯物主义的”或“思想进步的”。董仲舒和《淮南子》尽管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或多或少地受到忽视。儒法间的界线，现在认为是过于强调了，因为“四人帮”已倒台。有迹象表明，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如孔子、孟子、庄子、董仲舒和朱熹等人将受到更多关注，而不管他们“反动”的哲学立场。一个全国性的关于孔子和儒家的会议，正计划在孔子出生地的附近的山东济南召开。布德对冯友兰没来感到非常失望。自从代表团组建以来，冯友兰就是他最想见的人。尽管我们反复请求，但冯从未露面。可能因为他被指控卷入了江青的政治集团。在代表团结束行程回到北京后，曾第二次试图见他，但也失败了。

在中国文学组，法兰克(Hans Frankel)与阴法鲁教授谈及中国音乐及其与文学的关系的问题，这恰好是阴的专长。罗伊(David Roy)与王力教授探讨了中国语言学及其他相关事情。

布格与 81 岁的朱光潜教授讨论了艺术在中国的境遇。无论是艺术还是艺术理论的课程，北京大学都未开设，但在北京专门培养艺术家的院校里却开设了。事实上，从 1949 年起，通常对艺术和艺术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西方艺术的研究，严重忽视，甚至被回避。迄今为止，重点一直放在民间艺术上。而在其他领域，有变化的迹象。例如一本新

的学术期刊《艺学丛刊》将涉及美学问题。(应注意到在最近一期的《复旦大学学报》上,有一篇题为《论共同美》的美学论文,这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前也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朱保持着适度的乐观,他认为中国艺术会在"十五年左右"得到复苏。

在"文化大革命"中,朱和中国许多教授一样,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在北京大学,一些系的领导和教授被关押。朱在七十岁时,被拘禁了三个月。在他们放出来后,他和其他倔强的学者被隔离在校园里一个无法接近书的地方,安排他们根据命令写东西。如此苛刻地对待他,完全不顾他明显糟糕的身体,但这些都未曾使他气馁,他继续在自己的领域里从事西方美学理论、诗学和诗歌的研究。最近他完成了对黑格尔《美学》的翻译,不久将投身于一个巨大的项目中去,即在适宜的时候重新将莎士比亚的戏剧翻译成诗歌。戏剧翻译时要想到舞台,因为它们将来要上演。这个项目将由集体完成,他们对中英文诗歌和舞台知识有同样出色的驾驭能力。朱继续保持着对西方诗歌的兴趣,他最近阅读了一些发表在《世界文学》上的翻译作品,并渴望知道美国最近的诗人有哪些。他所谓的"最近"也许是自 1949 年以后。

我们最后去了图书馆。图书馆是一座 1950 年代早期的建筑。我们被告知,馆内藏书超过 3,100,000 册,包括期刊。我们穿过书架,在阅览室作了短暂停留。我们中的一个成员快速翻阅了书架上有关汉代的书籍,只见到 1950 年后的出版物,较早的著作也许收藏在别处。

下午,我们参观了著名的北京图书馆。代表团受到副馆长谭祥金先生、善本书库主任李致忠先生的接待。馆内藏书共约有 9,700,000 册,其中 2,000,000 册是线装书。现有馆舍太小,有许多书收藏在北京其他地方。约百分之六十是中文书籍,其余的外文书超过 60 个语种,但大多数是英、日、俄、德、法和西班牙文。馆内有 10,000 多种期刊,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科学和技术类。图书馆不向一般人开放,而且只有指定的知名人士才能借阅。馆内大约有 700 名职工。在我们参观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善本书库里很多的珍贵书籍。其中包括

公元440年的敦煌佛教稿本一卷；一件北宋早期的印刷品；《永乐大典》(永乐皇帝[1403—1425]时代的百科全书)中的一册；《四库全书》中的《汉书》；《盐铁论》的珍本；明代为皇子制作的一本华美的故事手稿，书里配以手绘的微缩插图，非常精美，色彩十分鲜艳，真是棒极了。作为一个从事严肃研究工作的地方，我们觉得图书馆的条件仍需要改进。在回饭店的路上，我们在北海公园停留了一下。

晚上梅侨和到访的天津大学陈国符教授谈了大约一个小时。陈博士是中国研究道藏文献中有关炼丹术的专家，他们探讨了《抱朴子》的成书年代和内容，以及早期的有关炼丹术的其他文献。陈博士询问了美国学者对这方面材料的研究情况。

10月20日，星期五，北京

代表团整个上午都花在故宫博物院和紫禁城。我们从南边的午门进入紫禁城，穿过乾清门，直抵最北边。建筑、宫廷和甬道仍给人十分难忘的印象。最近对一些地方进行了修复，因此它们或许保持着旧日皇家的风采。但有些地方情况恶化，已开始显出衰败的样子。在北面(皇宫里的住宅区)，我们看到青铜器、人工制品以及陶瓷的展览。陶瓷展中，展出的范围从新石器时代绘有图画的陶器延伸到唐代的瓷器。

我们最后参观了一套重要的房屋，那里有慈禧太后的私人戏台，她经常在此观看演出。在那里我们被招待喝茶，并有机会与唐兰谈了半个小时。唐兰是中国一流的古文字学家和金石学家，他又是博物院里的资深研究员。唐兰先生大约八十岁了，身体虚弱。我们被告知，他最近遭受了一次轻微的中风，那是1978年初他随一个中国考古展访问香港回来后发生的事。他已很长时间没有接待来访者了。我们同唐先生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从山东大汶口谈到马王堆帛书。在学术方面，唐和其他一些资深学者(如后来的徐炳昶)一样，反对“疑古运动”。“疑古运动”是杰出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在二三十年代领导的中国史学界的一场

运动。事后评价“疑古运动”，它的工作显然做得太过火。最近在西汉墓里发现的大量先秦文献已说明历史怀疑主义者的过激。在1930年代，这个运动波及中国考古学。但考古学就如一柄双刃剑，到了1950年代，徐炳昶、蒙文通、唐兰等学者开始用考古学将中国的历史推进到商朝之前。

现在许多中国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遗址曾是夏朝的首都。唐兰甚至很有雄心，想要将中国历史推进到黄帝时代（传统上的公元前2697年）。他的考古学证据是山东大汶口文化，特别是陶器上的标记或符号，通过对照甲骨文和金文，他相信那就是中国文字较早的形式。他从各种早期材料中深入寻找古代传说和神话的原文证据，他认为大汶口文化就是少昊（或少皞）历史阶段的文化，这一阶段大致与黄帝同时代。在此，唐兰不再按传统把少皞解释为一个人的名字，而是按照《山海经》把它当作商朝以前的一个国家的名字。[①] 唐有关大汶口文化的观点最近在中国考古学家中引起较大的争论。[②] 他的理论是否令人信服或甚至能否被人接受是另一回事。重要的是，面对疑古的挑战，像唐、徐这样的学者将早期中国文献材料的分析提高到一个新高度，对文献材料的分析更为圆熟，因此也显示了所可能涉及的材料的巨大复杂性。

有关马王堆帛书，唐论证了孟子学派《五行》原文来自于《乐正子》的理论，然而，在一个特定的点上，他似乎改变了较早的观点。他继续将黄老帛书当成《黄帝四经》，但他现在说它可能写于公元前300年左右，比他在较早的研究中给出的时间晚了一个世纪。[③] 龙晦支持唐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通过研究文本的韵律，可以推测它可能出自一个楚地学者之手。[④]

① 见唐的论文《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香港，1978年，页23—58。

② 《考古》1979年第1期，页33—36。

③ 《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并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最初发表于《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页7—38；再版于《经法》，北京，1976年。

④ 《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页23—31。

令人遗憾的是，唐先生于1979年2月中旬逝世。我们确实非常幸运，能有最后的机会向这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学习。

会议快结束时，我们中的一个人问博物院的人明清档案是否可以和外国学者见面。让我们吃惊的是，百万左右的档案卷宗还未完全分类。因此，除非确切地知道要查找什么，否则将很难有效地利用它们。

接待结束后，我们匆忙参观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早期中国绘画展。受时间的限制，我们仅看完元之前的部分，而完全略去了明清部分。

吃完午饭之后，几个成员立即去了北京友谊商店。下午5:12，代表团乘火车连夜赶往洛阳。

10月21日，星期六，洛阳

我们在黑暗中到达洛阳，时间是凌晨6:00。以洛阳市文化局副局长蒋若是先生为首的小规模接待组接待我们。在简捷的迎接仪式后，我们被送到洛阳友谊饭店，在那里蒋先生简要介绍了洛阳城和我们的行程路线。之后，我们整个上午都在洛阳市博物馆里。

博物馆有九个展室，从“原始社会”开始，结束于唐宋时代。目前博物馆里保存了400,000件文物。据蒋先生介绍，原计划建四幢建筑，这幢完成于1975年，其他三幢仍未开工，据说是因为“四人帮”的干扰。对于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展览的重点放在了汉代。博物馆有两个特别有趣的、突出的特点。首先，虽然展览以解说材料、地图、照片和出土建筑的模型（如二里头的宫殿模型）作为辅助，但展品都是原件（例如，展出的人工制品中没有复制品）。其次，在许多情况下，几组出土物品被放置在一起，因此人们可以自己在墓群中进行比较，并直观地了解一个典型的墓的内容。在洛阳地区就出土了几百个汉墓。其中225个烧沟墓非常重要，因此来自烧沟的文物自然就成了博物馆最具代表性的展品。[①]

---

① 见《洛阳烧沟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已知大约有七至八千个坟墓分布在洛阳附近。因此在此区域工作的考古学家对于坟墓的发掘已很有经验。他们首次运用一种钻孔法来判断坟墓的布局、类型、时代和大小,由此收集起来的信息用一个木质的标志物标识出来放在墓地上。将来当时间和经费允许了,就可以决定哪一座墓值得全面挖掘。

博物馆有大约六十个职工,四十多人与不同类型的考古工作有关。一些是中国史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来自于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一些是受过职业训练的高中毕业生,也有摄影师和绘图员以及野外作业的工人,工人通过感知表层粘土的土质确定地下坟墓的位置。蒋若是先生告诉我们,目前博物馆正筹划一个新的洛阳历史展,展览以旧文献资料和新考古证据为基础。

在此,应提到汉砖上所刻的"無任"(或"五任")字样。它用来标志东汉刑徒埋葬的位置,在洛阳地区发现。洛阳博物馆有一张大幅照片,拍摄了刑徒的葬身之地及记录他们姓名、死亡日期、劳役期限等的砖石。两种形式的无任在许多砖石上出现,再现了死亡的背景。博物馆里,解说的标签提示"任"字的意思是"技能"。按照这个解释,"无任"的意思"无技能",而"五任"意思是"能"。应指出,这个解释最初由张政烺先生发表在 1958 年的一篇论文里[①]。后来,陈直、于豪亮提出两种不同的看法。陈解释"任"为"官职",因此"无任"在汉代指违犯法律、被剥夺了官职的官吏,他们被罚去做苦工。[②] 于认为"任"可以和"保"互换,意思是"保证人"或"抵押品"。[③] 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列举了《管子》和《后汉书》中的注释。在上述三个解释中,陈的似乎最少说服力,而应得到更多注意的于的观点,至今在中国还未得到关注。有趣的是,在西方,按照沈家本的解释,白拉兹(Etienne Balazs)早在 1954 年就在《隋书·

① 见《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北京大学人文科学》1958 年第 3 期,页 179—184。
② 《古器物文字丛考》,《考古》,1963 年第 2 期,页 80—86。
③ 《居延汉简校释》,《考古》1964 年第 3 期,页 156—158。

刑法志》的段落中将“无任”解释为“无担保人”。[①] 白拉兹的解释后来得到杨联陞的支持,1964 年杨在法兰西大学发表的演讲中谈到了他的看法[②]。于的解释特别吸引人之处在于他将《隋书·刑法志》中的段落的意思解释为:对那些没有“担保人”的刑徒,为了防止他的逃跑,给戴上了脚镣。这个解释显然讲得通。而且 1964 年下半年在洛阳南郊,又有 522 个刑徒的坟墓被发掘出来,更多“无任”的题字被发现。按照 1972 年的报告,[③] 几乎毫无例外,“无任”的刑徒都被戴上了脚镣。这些最近的发现增加了于说的分量。1972 年的春天,在陕西咸阳县汉景帝墓附近,发现了西汉刑徒的埋葬地。许多骨骼上都有枷和脚镣,但没有发现一块刻字的砖。[④]

至于“五任”一词,白拉兹和张政烺两人都按照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的注解,将它解释为五种技术工,即木、金、革、彩、陶,而于豪亮则保持沉默,也许于的沉默使其他人在接受他关于“无任”的说法时犹豫不决,因为两个“任”明显不能有不同的解释。然而,杨联陞提出“无”字代表“伍”,五人一组承担集体责任。于是“五任”的意思是一组五人需要一个担保人(或者这个词也许能宽松地用来指任何担保人)。杨认为这个解释不仅充分地为制度史所证实,而且最适合于上下文关系。杨的建议似乎也或多或少地被 1964 年的发现所证实。在八个已知的“五任”的例子中,特地注明了三个刑徒是代替他人的。另一方面,任何“无任”的例子中没有发现代替的情况。代替者正是那些在刑期里逃跑了的刑徒的担保人,难道这不可能吗?[⑤] 有了杨对“五任”的重新解释,于说变得更有说服力。实际上,胡三省对“五任”的注释缺少坚实的文献

---

① *Le Traité juridique du "Souei-chou,"* p.46-a,张和于都引用了这段。

② *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des travaux publics dans la chine impériale*, collège de France, 1964, p.24.

③《考古》1972 年第 4 期,页 1—17。

④ 见《文物》1972 年第 7 期,页 51—53。

⑤ 对代替的不同解释,见吴荣曾《汉刑徒砖志杂释》,《考古》1977 年第 3 期,特别是页 194。

证据。他的五种技工的说法显然从《周礼·考工记》中得来,而在《考工记》中所列是六种而不是五种。胡武断地省去了一种(玉),显然是由于他需要找到一个名单以和数字"五"对应。[①] 然而,有些令人疑惑的是,这篇报告的作者不顾《考工记》和胡的注释之间明显的不符,仍同意后者的看法。此外,能否在同一条注释中严格依照郑玄对"无任"的解释,也值得怀疑。

下午,我们跑了很远去参观白马寺和洛阳东汉城墙遗迹。汉代洛阳城在现在洛阳城的东西,郑州—洛阳的公路正好从旧城位置穿过。我们首先到白马寺,那里正在维修,还没有正式开放。按照传统的看法,白马寺大约建于公元65年,它的名字与一个故事有关,传说最早的佛经是由一匹白马带入洛阳的。(也有另一个说法,讲一匹白马绕着寺院的佛塔跑。)但洛阳白马寺的名字直到公元289年才出现在佛教文献中。而且,在晋代晚期(3世纪下半叶到5世纪早期)不同的地方有许多寺庙叫白马。所以很难说我们去的那座洛阳的白马寺早在公元1世纪时就有了这样的名字。然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现在的建筑,虽然建于清代,但恰好是建在汉代寺庙的旧址上。因为根据牟子《理惑论》这部汉末的作品,第一个佛教寺庙建在洛阳以西、雍门以外。根据1964年、1972年对汉魏洛阳城的考古勘察,白马寺在东汉雍门以西大约一公里处,就很符合牟子的描述。[②] 而且,所有的材料,无论是佛教的,还是其他的,如《水经注》("谷水")、《洛阳伽蓝记》(卷四里的"白马寺")和僧佑的《出三藏记集》(卷七和卷八)所记,都和寺庙的位置符合。因此我们知道寺庙从东汉建造起到南北朝时代结束时(约公元580年),都一直存在。此后此寺庙作为佛教中心的声誉牢固地树立起来了,以至于在后来的任何年代里,当地的佛教徒不能全然将它的名字弃之不用。

---

① 见《考古》1972年第4期,页13。

② 见《汉魏洛阳城初步勘察》,《考古》1973年第4期,页200。

当地的主人告诉我们，现在清凉台拱门下的台阶所用的一些砖石可能是汉唐的。寺庙里第二古老的文物是大门两侧的两匹骏马，据说是宋代的。十八罗汉是元代的。我们允许在建筑外拍照，但不能在里面拍照。总的来说，这个由花园和前前后后绵延不断的小山围绕着的寺庙，营造着一种来世的平静氛围。

从白马寺出来，我们继续去看附近的齐云塔。齐云塔建于唐代，它看起来向前倾。因为塔是倾斜的，并且有密密麻麻的屋顶线，所以如果用石块敲击基座的地面，就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回音现象。

再往东走，我们参观了汉魏城墙的西段和东段。根据考古勘察，西城墙不相连的废墟有 4,290 米长，东城墙 3,895 米，北城墙 3,700 米。南城墙由于洛河逐渐向北改道的原因早已消失。郑洛公路恰好从西城墙的瓮门经过。从远处看城墙的颓垣残壁就像延绵在田间的小山，然而当我们穿过田野走近城墙去测量时，夯筑的土层则清晰可见。我们都爬上废墟的顶部，在那儿拍了几张照。我们看见北邙山向北延伸（我们曾要求去看山中的墓址，但被告知不通车），但南边的洛河由于距离太远而不能看见。

下午 6:30，蒋若是先生在饭店里设宴招待了代表团。

10 月 22 日，星期日，洛阳

代表团整个上午参观著名的龙门石窟。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城南十二公里处的伊阙。在那里，伊河流经一对酷似中国古代门楼的小山，伊阙由此而得名。石窟始建于北魏，扩建于唐代。随着佛教开始衰落，五代和北宋时期只增加了少数石窟。我们参观过的主要石窟包括万佛洞（680 年）、莲花洞（北魏）、奉先寺（675 年）和古阳洞（494 年）。其中古阳洞是最早的，但奉先寺是最富于艺术魅力的。奉先寺的主要雕像是高达 17.14 米的卢舍那佛，寺内还有迦叶摩腾这尊菩萨和保护神的巨像。古阳洞布满了神龛。神龛里有大小各异的雕像，那是北魏信奉佛教的

皇帝和贵族的捐赠品。这里也是中国中古书法的宝库,《龙门二十品》中的19件被雕刻在石窟的墙壁上。

在贵宾室休息了片刻,我们买了一些龙门碑刻的拓片。出来后,我们来到了伊河的东岸,享受特权看了两个石窟。由于遭到破坏,它们未正式向参观者开放。我们没能去宾阳洞,它是北魏风格的最好代表,因为正在维修,被脚手架所遮挡。①

回饭店吃完午饭,我们被带去参观洛阳轴承厂和厂幼儿园。这是一个有14,700名工人的大厂。目前,它年产26,000,000个轴承,包括1,380种,适用于造船、采矿、冶金和制造业。产品供应3,600个国内用户,并销往50多个国家。在幼儿园里,我们参观了几个班,并观看了孩子们的歌舞表演。

从工厂出来,我们回洛阳市博物馆去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洛阳考古队的两名成员,他们是许景元先生和陈久恒先生。他们向我们描述了最近在洛阳汉魏城南郊的发掘工作,那里曾是礼仪建筑集中的地方。到现在为止,他们已完成对东汉灵台的发掘工作,灵台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天文台。② 他们也在太学所在区域内发现了西晋时代的宿舍。另一个发现是熹平年间刻在石碑上的《尚书》残篇。残篇包括《尧典》、《禹贡》和孔安国的序,约300字。明堂遗址已确定,不久的将来将对其进行发掘。

会见结束后,我们去看两个汉墓。这两个汉墓已被转移到博物馆后面的工人公园内。两个汉墓中,一个是著名的西汉洛阳61号墓,发掘于1957年。这个墓大约在公元前48年到公元前7年之间,特别以壁画著名。据我们所知,其他绘有壁画的汉墓都是东汉的,这个墓确实

① 关于石窟修建过程的信息,见 Alexander Soper, "South 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Buddhist Art of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32[1960]: pp.47—112,关于石窟的照片见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的《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研究》,东京,1941年,照片虽旧但很全。

② 见《考古》1978年第1期,页54—57。

是中国发现的最早有壁画的坟墓。[①] 坟墓中的两幅壁画已被郭沫若鉴定为“鸿门宴”和《晏子》中的“二桃杀三士”。[②] 第二个鉴定无疑是正确的，但第一个似乎有问题。[③] 天花板上还有一幅星象图，由十二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描绘了有一只金鸡的太阳，第七部分月亮的中间有一只蟾蜍和一只兔子，右边（西边）有两颗星，剩下的部分都是群星。在墓顶绘制星象的惯例，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至少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时代。[④] 这个墓在美国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墓中壁画的复制品作为汉唐壁画展的一部分，在美国巡回展出。而且，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测定瓦片的时间为西汉末期。[⑤] 第二个墓是东汉的，墓饰以石雕，[⑥] 墓中有很重的旋转石门，上面雕刻着头戴皇冠的图形，具有典型的神秘主义色彩。一个雕刻得很精美的像龙一样的柱子很有趣，它支撑着入口，入口后是个小房间。

我们在6:00左右回到饭店，准备乘晚上10:50的火车前往西安。

10月23日，星期一，西安

凌晨6:40，我们在黑暗中到达西安，接待我们的小组人员是：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副局长张禹良先生，文化局文物处处长陈孟东先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席王汉章先生。我们被送到人民大厦

---

① 见《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页103—149和Jonathan Chaves, “A Han Painted Tomb at Loyang,” *Artibus Asiae*, 1968, 30. no.1:5—27。

② 见郭沫若《洛阳汉墓壁画试探》，《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页1—7。

③ 见余英时“Han China”，收入张光直编，*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收入本汉译集。

④ 见夏鼐《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考古》1965年第2期，页80—87。

⑤ 见Jan Fontein和Wu T'ung, *Han and T'ang Murals Discovered in Tomb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opied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Painters*,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1976, pp.20—33。

⑥ 见 Käte Finsterbusch, Verzeichnis und Motivindex der HanDarstellungen, Vol, 2, pl.256, Supplement 26。

饭店。过了一会儿,我们去临潼参观秦始皇墓。路上花了两个小时。经过秦始皇墓时,雾笼罩着坟墓,看不见它。我们先去了秦俑坑。在那里,考古学家吴梓荣(音译)先生概括介绍了秦始皇墓及兵马俑。他首先描述了秦始皇墓的地理位置,墓在渭河之西,距骊山南麓一公里,距临潼县城东 5 公里。据勘察,陵墓有外墙和内墙。墓的中心最靠近这些同心长方形的南面,墓冢有 76 米高,墓基地面积约 250,000 平方米(确切地说,墓基为 485 × 515,也就是 249,775 平方米)。内墙为周长 2,525.4米的正方形。它有东门、西门和南门。外墙为周长 6,294 米的长方形。东面有门。坟墓至今未被发掘,近期也没有任何准备发掘的计划。一个原因可能是这种规模的发掘活动需要巨大的花费,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缺乏保护技术和措施,只得谨慎从事,让文物保存在地下,直到条件允许时再出土。

迄今为止发现并挖掘了三个秦俑坑。1974 年发现了 1 号坑,它位于秦始皇墓以东 1.5 公里处,坑长 230 米,宽 62 米,深约 5 米,包括 11 个信道,被 10 道木墙隔开。黏土做成的武士排列在这 11 个信道上,前卫是 3 列士兵(每列 70 个士兵);3 列后卫面朝西方;2 名卫兵分列南、北两翼;中间有 38 列。总共有 6,400 名士兵和马匹。人的平均身高是 1.8 米,马长约 2 米,高 1.74 米。他们保持原有的颜色。[①] 1976 年 5 月,在 1 号坑以北约 20 米处发现了 2 号坑。挖掘工作在 1976 年 5 月到 1977 年 8 月之间进行。2 号坑的面积达 6,000 平方米,包括 1,000 多个塑像。它的建筑结构比 1 号坑复杂,包括四个单元,一单元有 6 个信道,二单元有第 7、第 8 两个信道,三单元从第 9 至第 11,四单元从第 12 到第 14。2 号坑的士兵类型也更多,包括步兵、骑兵、御者和弓箭手。从战争史的观点看,大量出现的战车是很有意义的。它们出现在第三个单元里,占据了整个空间结构的大半部分。这似乎说明战车在秦代军事力量中仍扮演着一个主要的角色。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坑中的

① 更多的细节,见《文物》1975 年第 11 期,页 1—23。

每一辆战车中都有一名御者,旁边有两位身穿铠甲的战士。这也十分符合较早的《吴孙子》里有关战车的说明。[①] 在2号坑里发现了3号坑,来之前我们不知道。它只占地500平方米,包括68个塑像、1辆战车和4匹马。田间考古学家暂把这个坑当作前敌指挥司令部。三个坑里包括8,000个兵马俑,黏土制成的兵马俑被烘烤过,并拿着真正的武器(包括青铜制成的矛、箭头、弩机和剑)。士兵的头是单独制作再安装上去的,他们面目各个不同。马的两侧显然有塞子(如同油箱的盖子),用来塞住腹部的洞,洞是为了避免在烘烤过程发生爆炸而留出的。坑的地下结构是土木结构。据考古学家认为,有迹象表明坑在建成后不久曾遭火灾。有一些人甚至认为可能是《史记》中记载的项羽在公元前206年的破坏。在1号坑遗址,一座巨大的博物馆正在建设之中。它宽72米、长230米、高22米,遮盖着遗址。博物馆将在近期完工,并准备于1979年10月向公众开放。

介绍完之后,我们先被带去参观一间临时的小展室,在那里展示着兵马俑的样品。接着去了建设中的博物馆,那里挖掘工作仍在进行。我们被允许在这两处拍照。最后,我们被领进附近的一间维修室,在那里女高中毕业生正受训将破碎的塑像复原。

正午之前,我们离开遗址,来到秦始皇墓。这时能见度有所改善,可以看出它是一座人造的小山。我们攀登上陵墓顶部,展望全景,周围的农村和南面的骊山仍很模糊。去华清池的路上,我们在临潼市文化馆稍作停留。那里有一小间展室,收藏着周代至秦代的人工制品。

我们在骊山脚下的一间大接待室里吃了盒饭,随后穿过美丽的庭院,来到华清池。我们中一些人在单独的温泉池子里泡澡。水中包含有益健康的矿物质,特别是熟石灰和硫磺(水温43℃或大约110℉)。华清池因七个理由而出名,其中包括著名的杨贵妃(8世纪)曾在此沐浴。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也是在这里被张学良"绑架",被迫同意

① 见《文物》1978年第5期,页1—15。

和共产党建立联合阵线抵抗日本。蒋于同年 12 月 25 日被释放。下午 2:00 左右我们离开华清池,直奔西安的陕西省博物馆。博物馆建在以前孔庙的所在地,它靠近西安古老的南城,有一系列漂亮的建筑和花园。展览分为四部分:历史文物、雕塑品陈列室、碑林和近期发现。在雕塑品陈列室,我们见到了来自唐太宗(627—649 年在位)墓的昭陵六骏。四件是原件,另外两件是铸造物,因为自从 1920 年以来那两件一直保存在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博物馆里。陈列室里其他几件有趣的物品包括:两扇西汉墓正门,雕刻着四灵(龙、凤、虎、龟);东汉石浮雕和一些高大的唐代佛像(包括那座非常著名的菩萨躯干雕塑像,它非常优美,身姿摇曳)。但我们的注意力被一个巨大的石像所吸引,据说她是来自西安附近汉武帝昆明湖的织女,在天上和牵牛共同构成一对人形的星座。1950 年代初被发现。[①] 由于某种原因这对雕像被分开了,牵牛被放置在别处。石像甚至看上去不像女性——雕刻非常古拙,甚至连石头的形状都没有改变。碑林建于 18 世纪,为的是保护古代的碑文,它是中国最古老的功能性博物馆。最有价值的系列是刻在石碑上的全套儒家经典,镌刻的时间是公元 837 年,即开成二年,这套石经后来被称作"开成石经"。它包括 114 块石碑,前后两面都刻有字,共计 650,252 个字。正文以楷书书写,标题用隶书。碑林总共有 1,000 多块不同的石碑,包括著名的贤明碑和唐代其他书法名作。我们匆忙浏览了其余两个部分。说老实话,至少需要一周左右来参观这个博物馆。

我们最后的停留处是西安的钟楼,它位于城市的主要路口上。1384 年始建于别处,16 世纪移至当前的位置。楼有 36 米高,由砖石基底和木质建筑构成。我们爬上楼顶,漫步在走廊上,俯瞰着城市。

晚上,张禹良先生在我们下榻的饭店举行正式宴会招待我们。

---

① 见《西安附近所见的西汉石雕艺术》,《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 11 期,页 3—5。

10月24日,星期二,西安

这天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张,我们要去乾县参观埋葬唐高宗(650—683年在位)和武则天(690—704年在位)的乾陵,还要去兴平县参观汉武帝(前140—前87年在位)的茂陵。我们早上八点过不久就离开了饭店,这比平常早,因为乾陵距离西安80公里,路上要花两个小时。

又是一个雾天,在西安这个时节出现这种天气很平常。当车驶过著名的渭河时,我们注意到水位十分低,当地主人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上游建了水坝。我们先到了永泰公主(685—701)的陵墓,乾陵博物馆就建在那里。我们受到一队当地官员的欢迎,包括乾县"革委会"副主席崔发源先生、乾县文教局副局长王万和先生、乾陵博物馆馆长韩世民先生和博物馆的一名职工杨正兴先生。我们在接待厅里听了有关整个乾陵区域的简介。

乾陵周围共有17个陵墓,如同卫星一般环绕着乾陵。9个属于皇帝夫妇的直系后代,8个属于高级文官和武官。乾陵本身未被发掘,但周边的5个坟墓在1960年到1975年之间已发掘。在这些坟墓中,永泰公主墓和章怀太子墓都以壁画出名。墓中出土了总共4,000多件文物,壁画总面积超过1,200平方米。

听了简介之后,我们乘车去参观乾陵。乾陵位于一座自然山的高处,雄视四周。我们上上下下走了一段很长的路,路的两侧有人和动物的石像。在最后一段上坡路的脚下,竖立着61尊石像,他们是参加葬礼的外国使节。我们得知,他们的头在大约一个世纪前的饥荒中被当地农民砍掉。出于某种原因,农民相信这些外国恶魔应为庄稼遭到破坏负责。最近找到两个头像,并对他们进行了复原,其中包括来自于阿富汗的使节的头像。当我们来到陵墓时,得知已经对陵墓进行了勘测,墓道入口的位置也已确定。

返回的路上,我们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了一个窑洞,它的主人邀请了

我们。这样的窑洞在这一带很典型。从黄土斜面挖进去一个大洞，再用草和泥抹墙，这样就建成了一个窑洞。黄土的垂直分裂和黏土般的坚固，使得建造这种民居成为可能。

回到博物馆，我们去参观了永泰公主墓。永泰公主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孙女，唐中宗(705—709 年在位)的第七个女儿，死于十七岁(按中国的算法)。死后五年，即 706 年，她和丈夫武延基合葬于此。1960 年 8 月 4 日至 1962 年 4 月 16 日之间，坟墓被挖掘。在这之前，它已遭到一定程度的盗挖。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具头盖骨破裂的尸骨，它是在盗墓者开凿的洞的正下方信道上发现的，在骨架周围散落了八件黄金饰品。这个可怜的人可能是在偷盗之后被他同伙杀死的。这说明除了这 8 件黄金制品外，墓中发现的金银制品也许不只这些。墓中供奉着许多文化制作品。特别珍贵的是壁画。壁画覆盖了信道、走廊以及两个墓室的全部墙面和天花板。在信道两边的墙上，我们所看到的两幅巨大的壁画是复制品。原先的壁画遭到很严重的破坏，因此移到博物馆里保护起来了。天花板上的太阳、月亮和银河是原有的，保存的状况很好。另一个历史和文化的重大发现是《大唐故永泰公主志铭》石碑，总共 830 个字。碑文由著名的文士徐彦伯[1] 撰写。这个墓的另一突出特点是有大量的塑像，像有三种：陶俑、唐三彩和木俑，共 878 件，其中包括汉族男女、胡人(有站立和骑马两种姿势)和动物(主要有马，但也有牛、猪、羊和骆驼)。这些塑像连同它们的饰物是研究中国唐代生活的宝藏。[2] 1973 年在巴黎和伦敦举行的中国考古发现展部分包括了这些塑像。[3]

吃完午饭后，我们驱车去了兴平县内的汉武帝茂陵。在那里，兴平县外事办副主任祝培良先生和茂陵文物管理中心主任王志杰先生接待了我们。

---

① "徐彦伯传"在《旧唐书》卷九四和《新唐书》卷一一四。

② 见《文物》上的一个总结报告，《文物》1964 年第 1 期，页 7—18。

③ 见夏鼐《巴黎伦敦展出的新中国出土文物展览巡礼》，《考古》1973 年第 3 期，页 176。

茂陵位于兴平县东北的高原上，它是11座西汉皇帝陵墓中最大的一座。从汉武帝执政第二年就开始修建，据说每年花费他个人收入（由少府管理）的三分之一。据勘测，陵墓高46.5米、顶部面积为39.5×35.5平方米，底部面积为321×324平方米。陵墓有围墙，围住的面积有430.87×414.87平方米，围墙有三个门，分别位于东侧、西侧和北侧，门高出地面。21座卫星墓分列东边和西边，5座已确定，是霍去病墓、霍光墓、李夫人墓、卫青墓、金日磾墓。我们先去了霍去病墓，霍去病是汉武帝所喜爱的三位将军中的一位（另外两位是卫青和李广利）。我们爬上陵墓的顶部，在那里我们看见几个大小相似的古墓大致沿着一条东西中轴线，耸立在高原的不同方向上。几十年来，霍去病墓特别以石雕闻名。本世纪初，沙畹（Edouard Chavannes）到访过。[①] 1920年代后期，日本考古学家水野清一参观了这里，并拍摄了他所能见到的每一座石雕。后来他发表了配有图片的报告，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据马子云1933年写的一篇文章介绍，霍去病墓附近的石雕在16世纪中叶的地震中受到很大的损坏。然而，所有大而重的石雕完整无损。[②] 当初，汉武帝命令将霍去病的墓建成祁连山的形状，霍去病曾于公元前121年在那里决定性地击败了匈奴。[③] 因此，陵墓顶上和周围放置了一些巨型石像以及大块的岩石，岩石未经雕刻或只进行了粗加工。因为所有的雕刻作品都移入两旁的陈列室（1964年建）里，陵墓不再保持祁连山的形状。

现有16个巨像，其中7个发现于1957年。包括大象、鱼、蛙、龟、羊、牛、熊、马、虎和最出名的“马踏匈奴”。所有的雕像都反映出共同的特点：朴实、有力以及尽可能保持石头的原有形状。一个艺术史家认为，这可能与早先想要使陵墓与祁连山相像的设计有某种联系。[④] 我

---

① 见他的 *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e Chine septentrionale*, 1 vol. of text and 2 portfolios of plates, Paris, 1909—1915。

② 见马子云《西汉霍去病墓石刻记》，重印于《文物》1964年第1期，页45—46。

③ 见《汉书》卷五五。

④ 见傅天仇《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前的西汉石雕艺术》，《文物》1964年第1期，页40—44。

们得知，最近几年在茂陵及霍去病墓附近发现了六百多件文物。1975年，在陵墓东南1000米处发现了一块精美的玉辅首，玉辅首上刻有动物面具，曾在欧洲和日本展出过。其他发现包括鹅卵石铺过的道路，空心砖和瓦当，所有这些都是汉代的。参观完霍去病墓，我们去了茂陵，但那儿除了坟冢本身，就没有什么可看的，我们在它前面拍了些照片。

回西安的路上，我们在咸阳市博物馆稍作停留。咸阳市博物馆和西安的省博物馆一样，是建在古老的孔庙里的。我们在馆长王风林先生和副馆长杨浚清先生的指引下参观了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专门展出秦汉时代的人工制品，每个时代有三百多件展品。另外，这儿有一个特别的展室，展出着1965年首次在杨家湾发现的西汉陶俑军阵（士兵和骑兵）。后来在1970年，考古学家开始在那一带发掘出两个汉墓，他们称为4号墓和5号墓。杨家湾的两个墓位于汉高祖的长陵与汉景帝的阳陵之间，但更靠近长陵。它们暂时被确认为长陵的卫星墓。发掘工作直到1976年底才完成。总共发现11个坑，它们围绕着两个墓呈卫星状排列，其中包括6个骑兵坑，4个步兵坑和1个战车坑，兵马俑的总数达2,400。它们非常像在秦始皇墓附近发现的那些兵马俑，但大小仅是其四分之一。这两个汉墓曾被认为是将军周勃和他的儿子周亚夫的墓。然而这个鉴定仍是暂时的。[①] 只有大约700个兵俑在博物馆中展出，但它们合起来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博物馆馆长慷慨地允许我们为它们拍照。

下午6:30，我们回到饭店。匆忙吃完饭，便去看木偶戏。演出在一个大剧院进行，剧院里坐满了观众。演出的节目是《西游记》中的一段情节，即《孙悟空三调芭蕉扇》。木偶大约是实物大小的二分之一，由人在下面用线和棍子操纵，操纵木偶的人不为观众所看见。演出非常

---

① 见《文物》，1977年第10期，页10—16，以及展力和周世曲讨论杨家湾出土的骑兵俑的论文《试谈杨家湾汉骑兵俑——对西汉前期骑兵问题的探讨》，同上，页22—32。

成功，整个代表团的成员和中国观众一样感到欣喜若狂。直到谢幕时，我们才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表演者都是二三十岁的年青人，也许在“文革”期间他们能继续训练。

10月25日，星期三，西安

这一天，两位来自于西安市文物管理处的考古学家加入到我们中间。他们是畅耀先生和姜开任先生。他俩为我们导游，带领我们参观秦汉建筑的遗迹。我们先驶往著名的未央官，但在浓雾里，能见度很低，除了山而外，几乎所有的东西都隐藏在雾里。于是我们被迫改变早上的时间安排，去了半坡新石器村。自从1953年发现以来，这个仰韶文化村已被公诸于世。现在半坡博物馆已成为考古学家和游客感兴趣的西安几大历史景点之一。半坡是一个很大的定居点，面积约为50,000平方米。村庄完全被一条人造壕沟所包围，壕沟深和宽5至6米。博物馆展览室主任赵文艺先生领着我们穿过了许多展厅。在博物馆后面，巨大的拱形结构遮盖着半坡村已挖掘的部分。沿着墙用木板搭建起走道，从上面我们可以俯瞰房屋遗址、储藏坑、墓地、重建的茅舍，等等。最后我们被带到拱形结构的后面，那儿有间上锁的房子，我们进去看了一座保存得很好的新石器时代的窑。

从半坡博物馆出来，我们去了大雁塔。大雁塔实际上位于西安以南8公里处的慈恩寺内。慈恩寺建于唐太宗时期，由太宗未来的继承人、后来的唐高宗主持修建。当慈恩寺竣工时，太宗邀请著名的僧人玄奘留住于此，翻译他刚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这是一项规模巨大的工程。传说，玄奘依照他在印度所见的佛塔的样式设计了大雁塔。大雁塔建于永徽年间(650—655)，塔的名字也很可能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有一个佛教故事讲道，一只大雁情愿牺牲它的生命，以充当饥饿僧人们的食物。于是像对待僧人一样，人们在埋葬它的地方，为它建起了一座佛塔。大雁塔最初只有五层，后来增加了两层，它现在的高度是64米

(248级台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爬上顶层,然而大雾再次模糊了我们的视线。我们得知,在晴朗的日子里,能看见渭河对岸秦始皇陵那么远的地方。佛塔在16世纪重建,因此墙上的文人题字几乎都是明清时代的。唐代有一个惯例,科举考试的成功者——进士要将他们的名字写在大雁塔的墙上,这一风俗被称为雁塔题名。因为皇帝通常在曲江池边设宴祝贺新科进士,宴会结束后,许多进士会去参观大雁塔,并在塔上留下他们的名字。我们询问了有关曲江池的情况,结果发现它早就消失了。

下午2:30,除了杜尔和斯佩曼(Douglas Spelman)外,代表团第二次去参观汉未央宫,这时未央宫比在早晨的雾中显得清晰。据我们的主人——两位考古学家介绍,我们脚下的大土台就是未央宫前厅的地基。从台上看,西北方的石渠阁、天禄阁依稀可辨。未央宫东北方的武库从1976年开始挖掘,大约一半的地面已被勘测。我们被告知,宫殿区域内的发掘工作将继续进行。当武库的勘测工作结束后,未央宫的地基也将被发掘。

离开未央宫地基,我们被带去参观长安汉城的西城墙。与洛阳东汉城墙遗迹一样,夯筑的土层清晰可见,有很多层,土层3—4英寸厚,水平方向的洞也很明显,木梁曾放置于此以加固墙体。

这天我们最后停留的地方是秦始皇的阿房宫,它位于渭河以南7.5公里处。现在遗存下来的是3.5×1平方公里的地基。我们得知,钻探测试已显示下面没有什么东西。

返回的路上,我们经过了西安的城门,这是明代的建筑,它的各个侧面有许多像窗户一样开着的东西。我们原计划晚上10:20从西安飞往兰州,但由于天气的缘故,航班被取消。

10月26日,星期四,西安

我们醒来发现天气比头天还糟,不仅有雾,而且风雨交加。我们被

困在西安，我们的主人中国社科院，显然和我们一样焦急。感谢他们的努力，我们坐上了下午 5:58 的火车。最初的旅行路线相应地作了修改，我们不在兰州停留，直接去敦煌以北 120 公里处的柳园。一节一等软卧车厢专门为我们加挂在上海—乌鲁木齐的火车上。以张禹良先生为首的当地主人在火车站为我们送行。

10 月 27 日，星期五，去敦煌的途中

上午 10:00，我们的火车到达兰州站，大约晚点两小时。我们受到一队人的欢迎，他们是我们从敦煌回来后的主人。一位来自甘肃省外事局的当地导游赵小姐上了我们的火车，她将伴随代表团去敦煌，并随团回兰州。

11:17，我们经过河口南，火车正由北向西北方向行驶。此时，与黄河平行。我们正进入河西走廊，从秦汉时代起，这里就被称为河西。许多地方看起来得到很好的耕耘，河谷有充足的水，生长着小米、燕麦、玉米、大麦、棉花、果树等。多数房屋都是夯筑起来的土屋，窗户以细木格作为装饰，并用厚实的糯米纸贴在上面。当我们穿行在河西走廊中时，两旁的山逐渐变得很狭窄。当看见向南延伸、白雪覆盖的祁连山脉时，我们所在的高度，海拔约 6,000 英尺。下午 3:00，我们经过乌鞘岭，海拔超过 9,000 英尺。3:45 经过天祝，这是我们这次行程的最高点（海拔可能超过 11,000 英尺）。接着火车开始逐渐下降，向武威驶去。武威是汉代四个河西指挥部中最早的一个，其他三个依次是张掖、酒泉和敦煌。下午 5:45，我们到达武威境内，此时天已经黑了。

10 月 28 日，星期六，去敦煌的途中和在敦煌

大约上午 10:00，我们抵达柳园。在那里遇见从酒泉开来的一辆轿车和两辆面包车。我们立即出发去敦煌，12:45 到达那里。在两个

半小时里，我们驶过流沙沙漠，这段经历非常有趣。在沙漠中间，我们路过一个农业站，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灌溉渠用党河里的水。半路上我们停下来，观看一个汉代的土瞭望塔遗迹（据我们的当地向导所说），并拍照。我们也为公路边一群放养的骆驼拍照。骆驼拉车和身穿羊皮袄的人骑着骆驼的景象，特别容易使人想起汉唐时代的边塞生活。

敦煌城很小，人口大约10,000，整个县的人口大约有90,000。我们住在敦煌县宾馆里，这是只有一层的综合设施，通常用于接待来开会的邻县干部。必须指出，由于敦煌还未正式向外国旅客开放，所以缺少现代的设施。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们团是首批来访的美国代表团。

吃过午饭后，我们驶往著名的莫高窟，它也被称为千佛洞，位于县城东南25公里处。在城市的范围之外，我们看见沙漠中间的褐色的沙丘，它给人的印象很深。从古至今，它被称为鸣沙山。沙丘的脚下是砾岩峭壁。石窟就在那里。与石窟遥遥相望的是著名的三危山，虽然相隔几里，但清晰可见。

代表团首先去了敦煌文化研究所，研究所正好在石窟下面，我们受到所长常书鸿先生和他的五个职工（施平亭先生、蒋毅明先生、李永宁先生、赵秀荣先生和孙秀珍女士）的接待。常教授是位艺术家和历史学家，早年曾留学巴黎。40出头来到敦煌，现已76岁。在中国，他献身敦煌石窟的事迹已成为传奇，著名的新闻记者徐迟将他写入报告文学，题目是《祁连山下》。[①] 1943年常创办了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改为敦煌文化研究所）。他讲了许久的话，对我们表示欢迎，并介绍情况，一些职工不时作点补充。就敦煌石窟而言，应作如下的概述：据698年的一块石碑[②] 记载，最早的石窟建于366年，由释乐僧修建。唐代早期，石窟和佛龛就有1,000多个。到现在保存下来的石窟只有492个。石

① 收入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中，北京，1978年。

② 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

窟按年代分为南北朝时代43个、隋代79个、唐代243个、五代8个、宋代8个、西夏3个、元代4个。年代很清楚的石窟中,最早的是537—538年的石窟(第285号),最晚的是1002年的石窟。[①] 石窟内壁画面积达45,000多平方米,窟内还有2,000多件唐宋时代的雕像和5个木质建筑。

接待结束后,我们分成两组参观石窟。一组由施平亭先生带领,另一组由蒋毅明先生带领。两人对于他们身后的绘画和佛教传入前后的故事都了如指掌。总体上石窟比以往任何时候得到更好的保护。我们被告知,1962年开始修建保护石窟的门和封闭式走道。洞中没有灯光,我们的向导用高能手电指示那些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部分给我们看。总的来说,雕像和壁画保存得非常好。除了多处损坏外,其他地方色彩鲜明得令人吃惊,细节也保存得很好。然而正如我们的向导所指出的,在许多情况下,绘画所用的一些颜料成分已改变了颜色,产生出来的效果与当初艺术家们想要达到的截然不同了。洞内“禁止拍照”的规定得到很严格地执行,理由是照相机的闪光灯对颜料的色彩特别有害。

6:30左右,我们回到宾馆。紧接着出席了隆重的宴会,宴会的东道主是敦煌县“革委会”主席文玉西先生、副主席杨士科先生以及常教授。

10月29日,星期日,敦煌

除去两个小时的午餐休息,从早上8:30开始我们用整天时间参观石窟。石窟面朝东,早上的光线比下午好。我们分两组,共看了62个石窟,它们是:

---

① 石窟有三种编号系统:数字前以字母P开头的是佩里欧特(Pelliot)的,C开头的是张大千的,而那些不以字母开头的是研究所的。研究所的编号系统是最全面的,因而在文章中采用此编号。

南北朝:249(西魏);254(北凉);256(北魏、重建);257(北凉、有鹿本生);259(北魏早期);263(北魏);272(5世纪晚期);275(北凉);285(539);288(5世纪末);290(魏);296(北周);428(北魏石窟中最大的);431(北魏)。

隋:305(585),390,402,419,420,427;

初唐(618—712):057,096,098,220,320,321,322,323,329,332,335;

盛唐(713—762):045,073,130,319,384,445;

中唐(763—820):158,159,194;

晚唐(821—906):009,012,016,017,156,196;

五代和宋:061(后晋),328(西夏),409(西夏);

元:003。

此外,我们看了第444号窟,这是唐代的石窟,但不知确切的年代。我们还看了另一个唐代石窟,它未被编号。我们中有一组人也看了下面的石窟,其年代不得而知:103,172,217,248,268,299,321,424,432。从这些石窟出来,我们被带去看两座弥勒佛的巨像,一座36米高(时间为695年),另一座26米高(时间在750—760年之间)。

在参观过程中,我们看到小石室(17号石窟)都很兴奋,1899年道士王圆箓在此发现了著名的敦煌手卷。小石室不仅与16号石窟相连,而且实际上就位于16号石窟内。我们博学的向导向我们详细地说明了有关这个小石窟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比如它的建造以及后来砌墙将它封闭。在我们参观后不久,马世长发表了一篇论文。[①]我们向导的观点显然主要是以马的研究为基础的。第一个问题是17号窟建于何时、被何人所建。马令人信服地指出16号和17号石窟的修建与僧人洪䛒有直接联系。851—862年之间,洪䛒受唐代政府指派任河西都僧统。马又令人信服地证实修建16号窟是洪䛒的

① 马世长:《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文物》1978年第12期,页21—33。

工作，并且17号窟最初是为纪念洪䛒而设计修建成石室的。然而，洪䛒同时修建16、17号窟的论断[①] 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意谓着洪䛒为纪念他自己而建此石室。小石室最有可能是在洪䛒死后，由他的继任法荣(862—869年在位)，或他的弟子悟真(869—895年任河西都僧统)增建于16号窟内。[②]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时候这个石室被封住以及为什么。佩里欧特的观点很有影响，1908年他认为，当面临西夏入侵时，石室被封住，时间是1035年。现在这个观点受到挑战。佩里欧特的依据有两个：1、在可以确定时间的手卷中，最迟的是至道年间(995—997)；2、没有发现西夏字体的手卷。而且佩里欧特发现手卷放置得很杂乱，表明可能是害怕遭抢劫而在匆忙中将石室封闭起来。马世长认为，佩里欧特的理由在许多方面没有说服力。首先，虽然1036年西夏占领了瓜州、沙州和肃州，然而直到几十年后，他们才成功地巩固了对这一大片地区的统治。这从他们连续向宋代朝廷纳贡的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沙州于1037、1040、1041、1042、1050、1052年曾向宋代朝廷纳贡，而敦煌恰好是沙州的一部分。其次，尤其在这段时期内，敦煌处于汉族曹氏家族牢固的控制之下。在440号窟北面的外墙上，最近发现了一处1046年的汉文。有意义的是，文中仍沿用宋代庆历六年(1046)的年号。

再次，西夏统治阶级也以虔信佛教而闻名。僧人似乎没有理由担心佛经会遭破坏。最后，手卷在被发现时不会是杂乱的。因为在斯坦因(Stein)和佩里欧特到来前，王圆箓和一些中国官员为了检查，已经将手卷移动了。马因此同意中国专家陈垣后来的意见，在《敦煌劫馀录》的前言里，陈垣认为封闭石室应发生在皇佑(1049—1053)后。然而，为什么不得不秘闭石室仍是一个谜。

参观17号窟时，我们看见了洪䛒的雕像。当王圆箓第一次发现石

① 马世长：《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文物》1978年第12期，页23。

② 有关悟真，见陈祚龙，*La vie et les oeuvres de Wou-tchen*(816—895)：*Contribution à l' tistoire culturelle de Touen-houang*，Paris，1960。

室时,像不在石室内。出于未知的原因,在封洞时雕像被移到362号窟。1965年常书鸿和他的职工对雕像作了鉴定,从此以后它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与此相关的是,最近在敦煌一带收集到总共9,946页藏文手稿(大部分由敦煌县文化办公室收集)。在这些手稿中,8—9世纪的当地政府文件已经过鉴定。这些藏文手稿最初出自石室,至今未被仔细研究,希望将来对它们的研究能透露有关吐蕃占领时期敦煌一带的新信息。①

近期在莫高窟内的其他发现也应提到。例如,1963年在发掘莫高窟前面的建筑遗迹时,不仅发掘出从五代到元代的建筑,也发现了6个大大小小的新石窟(编号:487、488、489、490、491、492),因此石窟的总数达492个。② 1975年10月,研究所的人移开222号窟壁画上西夏的那一厚层,希望发现它后面有更早的东西。结果完全不出所料,他们成功地发现了中唐、晚唐和五代时的壁画。③ 因为莫高窟里的许多墙被画过不止一次,用这种剥离的方法将使敦煌壁画的总数大量地增加,对于这一点应不足为怪。

由于我们是首批来敦煌的美国官方代表团,常教授请我们在离开莫高窟之前,将姓名写在研究所的贵宾簿上。我们和主人拍了几张照片。代表团团长余英时被邀请写一中文诗词以志纪念:

《调寄西江月》
初访鸣沙山下,
莫高藏宝无穷。
汉唐艺术有遗踪,
文化东西并重。④

---

① 见黄文焕《河西吐蕃文书简述》,《文物》1978年第12期,页59—63。
② 见《文物》,1978年第12期,页47—56。
③ 见《文物》1978年第12期,页41—46。
④ 编按,诗词回译不易,幸好余英时先生25年后还能由英文回忆起原词,特致谢意。

10月30日，星期一，回兰州途中

早上4:30左右，我们起身去柳园赶8:10的火车。气温很低（-5℃），冻得人难以忍受。我们在模糊不清的黑暗中驶过沙漠，只有东方一轮朦胧新月为我们照明。7:00过一点，我们到达车站，马上被领进两间有炉子的接待室。由于刹车出了点小问题，火车直到8:40才开。这又是一段二十四小时的旅程。下午1:00我们正吃午饭时，火车驶入最高点。突然，在铁路的北边，我们看见一个塔和从它那儿延伸开去的一段土墙。那就是著名的嘉峪关，明代长城的最西端。我们中一些人居然抓拍到几张照片，而此时火车正全速前进。

10月31日，星期二，兰州

大约早上8:00，我们到达兰州。在火车站，我们受到甘肃省社科院书记朱瑜先生、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兼兰州大学历史系主任金宝祥先生和甘肃省博物馆馆长吴怡如先生的迎接。接着我们被送到友谊饭店，这是座十一层的现代建筑。我们原计划在兰州只停留一天，但不得不滞留到11月3日，因为直到那一天才有去长沙的飞机。我们也曾打算坐火车去长沙，但又因为火车临时中断服务而不能成行。

下午2:30，我们参观了正对我们饭店的甘肃省博物馆。博物馆收藏了本省大量的人工制品。展出的新石器时期的陶器是极好的，范围涉及甘肃仰韶阶段各个时期的制品。除了分布图、碳14的年代表外，给人印象特别深的是来自于武威的汉代牛车木刻。汉代（大部分为西汉晚期和东汉早期）的木质随葬品，在博物馆的收藏中扮演着突出的角色。博物馆的人认为，这一带汉墓中出现大量的木雕是因为干燥的土壤使得保存它们成为可能。博物馆里展出了汉代木简的样品，包括10年前在武威发现的著名的《仪礼》简。

11月1日,星期三,兰州

早上8:30,我们第二次参观博物馆。我们首先惊讶地发现,嘉峪关5号墓已被移进博物馆,并按当初发现它的样子重建。据馆长说,这项工作花了一年时间才完成。据我们所知,最初在嘉峪关总共发现了8个墓。1972至1973年对这些墓进行了发掘。1972年,墓被误定为东汉墓。但在1974年,年代被精确地推算到魏晋时期。这些墓尤以生动的画像砖闻名。1号墓的主人名叫段清,他显然是来自于这一时期河西地区很有势力的段氏家族。[①] 画像砖的复制品参加了1976年的"汉唐壁画"展,到美国展出过,因此无须在此介绍。然而应顺便提到的是,最近中国的艺术史家开始探寻魏晋墓壁画(包括嘉峪关的那些壁画和1977年在酒泉丁家闸发现的墓画)对敦煌石窟早期绘画可能产生的影响。[②] 过去只注意到伟大的敦煌艺术受到印度的影响,而未同时留意到魏晋时代本国传统的影响,这一看法也许会被认为是片面的。

大约10:30,我们和以岳邦湖先生为首的当地考古学家开了个会,讨论最近在居延发现的汉简。岳先生报告说,在1973—1974年的发掘工作中,总共发现了20,000多支木简。它们来自于三个不同的遗址:1. 甲渠候官(也被称为破城子,超过7,000支);2. 肩水金关(超过11,000支);3. 酒泉候官的第四烽火台南。特别重要的是捆扎在这些木简中的许多长文书,已发表的报告中对它们有详细的报导。[③] 概括说,它们包括四大类:

1. 政策法令和重要事件。

公元前52年的一份写在三支简上的文件,涉及广陵王叛乱的事,

① 见《文物》1972年,第12期,页24—46;1974年第9期,页55—70。

② 见张朋川《河西出土的汉晋绘画简述》,《文物》1978年第6期,页59—71,以及段文杰《敦煌早期壁画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文物》1978年第12期,页9—20。

③《文物》1978年第1期,页1—11。

可以用它来补充《汉书》中对此事件的叙述。另一份公元30年的文件透露了汉代对河西地区附属国的政策。根据此政策,禁止对纳贡人进行劳役、家畜和土地方面的剥削。而且,"秦胡"一词说明这个地区的一些汉族人可能在秦末曾加入匈奴。

2. 有关边塞系统的活动可以进一步划分为:

①像在其他东汉文件中描述的防御系统一样,用各种各样的烽火标记报告匈奴的入侵。

②边塞官吏的任免。

③军事奖惩条例。

④日常的边塞事务和公文,如修建城堡、官奴婢的通行证、病假条,等等。

⑤各种登记表,包括人员、武器、薪水、粮食等的登记。

⑥法律报告(爰书),比如公元27年的一份书写在三十六支简的文件,是所有文件中最长的。它是一份包括债主(栗发或粟发)和债务人(寇恩)的法律讼案的完整报告。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文件对于我们理解汉代法律制度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首次详细了解法律诉讼是如何归档、审判和判决的。[1]

⑦有关边塞劳役、军事设施、烽火台的名称和地点的文件,有关驿站、征兵、税收、商品交易、雇佣情况等的记录。

3. 书简资料,包括有关算术、《论语》、医学、历法、天文和地理等著述的残篇。(一支简记录着从长安到河西的距离以及途经的驿站。)

4. 注明了时间的文件。1,222支简注明了时间,其中最早的是公元前119年的一支。从昭帝(前86—前74)时期到王莽时期,都有连续的时间标注。东汉初年(23—?)的木简所显示的纪年非常混乱,一些木

① 整个文件的整理和研究,见《文物》1978年第1期,页30—31,以及俞伟超《略释汉代狱辞文例》,同上,页35—41。

简沿用隗嚣统治的年号，诸如“复汉元年”，即公元23年。（这与《后汉书》中给出的统治年号有区别，《后汉书》中是“汉复”。）一些甚至沿用赤眉军的统治年号，如“建世二年”，即公元26年。还有另一种沿用西汉平帝的统治年号，如“元始廿六年”，即公元26年，而这个年号并不存在。

下午，我们先被带去看了一个工艺品商店，接着去了五泉公园。公园里保存了一座以前的寺庙，寺庙的建筑可以追溯到明代。公园的管理者尹建鼎先生在山顶的接待室里向我们简介了有关这个地方的情况。我们最后去了公园附近的动物园，动物园位于山坡上。

11月2日，星期四，兰州

我们用整天时间参观了刘家峡水电站。刘家峡建在兰州西南70多公里外的黄河上。在两个小时的路程中，我们大多数时间行驶在盘山公路上。我们穿过了一个非常狭窄的峡谷，峡谷两旁是高耸的悬崖和群山，它们呈阶梯状向上耸立，直达顶峰。

11月3日，星期五，兰州至长沙

上午10:15，我们离开饭店去机场。机场位于城外72公里处平坦的河谷里，河谷在黄河以北的远处。但当中午我们到达机场的时候，却被告知航班再次推迟，因为西安的天气很糟，而我们的飞机要在那儿停留、搭人。下午4:00，我们的飞机终于起飞。虽然雾很大，但飞机平稳地降落在西安。晚7:00，飞机再次起飞，8:45到达长沙。我们照例在机场遇见了当地的主人。他们是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方平先生和同一个研究院的顾群先生。我们下榻的湘江宾馆是一座新建的饭店，有现代化的设施。从兰州到长沙，气候形成鲜明的对比，看见蚊帐挂在我们的床上，我们感到很新奇。

11月4日,星期六,长沙

8:30,我们离开饭店去省博物馆。不幸的是博物馆的主体建筑因修缮而关闭,但我们能去看马王堆展,尤其是看从1号墓里出土的令人惊讶的人工制品。我们都或多或少地通过出版物对这些发现有所知晓,但观看原件是种完全不同的体验。例如,三口棺木上漆出来的精致图案,实际上是突出于棺材表面的三维浅浮雕,这在照片上是根本表现不出来的。漆器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看了原件后,没有人会不同意如下的论述:这些漆器"是中国迄今出土的西汉漆器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并且在器皿的样式上最富于变化的一组"。[①] 毫不夸张地说,来自于马王堆的漆器几乎使较早在乐浪和诺颜乌拉引起轰动的发现失去意义。展出的其他人工制品包括木雕、石弓、乐器(如琴和笙)、陶器、一套雅致的用于六博游戏的漆器(3号墓出土)、美丽的纺织品与绣品等等。然而展览只展出了那幅著名的有关灵魂升天的帛画的复制品,原件保存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我们接着去地下室看保存得很好的軑侯夫人的尸体。她独自占据了一间屋子,而其重要器官则保存在隔壁房间的玻璃容器里。有趣的是,在她五十多岁死的时候,戴着假发。导游告诉我们这个秘密是如何被揭开的,因为分析显示她的血型是A型,而假发是一个B型血型的人的。从那里我们被带去看庞大的外椁,它们来自于1号和3号墓,由巨大的厚杉木板制成,没有使用钉子。

简单地浏览了博物馆的商店之后,我们驶向城边的马王堆原址。1号和2号墓已被填埋,3号墓(儿子的墓)一直保持着它在新建的屋顶下被发掘时的样子。坑深13米,坑壁是陡坡,接近坑底的地方有架子。

在博物馆里的时候,主人告诉我们,他们准备出版一份完整的报

---

① 湖南省博物馆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英文摘要),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页5。

告,报告三个墓的出土制品和遗物,包括破损严重的第三张地图,即北京的学者认为无法出版的那张。博物馆有二十多个考古学家,他们的足迹遍及整个湖南省。到目前为止,发现了大约 1,000 个汉墓。据当地考古学家说,汉墓和楚墓形式上的差异很小,但成熟的汉墓和早期的楚墓在形式上有区别。

下午,我们先参观了湖南瓷器展,接着访问一个工厂。工厂里各种年龄层次的妇女从事设计和制作丝绸绣品的工作,作品最有趣和耗时最多的是那种双面绣。我们最后去了前耶鲁在中国的医学中心,现在那儿已变成了湖南医学院的校园。

下午 6:30,为了表示对我们的敬意,以当地专家的名义举行的宴会设在我们下榻的饭店。

11 月 5 日,星期日,长沙至昆明

我们原打算在 11 月 4 日下午到昆明,但我们的航班又因雾而延期。北京的主人告诉我们,昆明方面的人已到机场迎接代表团,自然是白跑了一趟。

早 8:30,我们过湘江,去著名的岳麓山,那里有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遗迹。山脚下有池塘、柳树和爱晚亭。我们得知,参加革命之前,年轻的毛泽东常到这里来欣赏亭子周围的景色。亭子最初叫红叶亭,因秋天艳丽的枫叶而得名。诗人袁枚(1716—1798)为它取了现在的名字,名字源于杜牧(803—852)的名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我们从爱晚亭上山,途经黄兴和蔡锷的墓,半路上在一座寺庙稍作停留。据导游介绍,早在公元 269 年,这座山上就有了湖南的第一个寺庙。最后我们到达山顶,在一座综合大楼的接待室里休息了三十分钟,不幸的是我们的视线被早晨的浓雾遮挡。

从某方面来说,岳麓山是过去 17 个世纪里中国历史的缩影。它是 3 世纪至唐代佛教的一个基地。在宋代,它成为理学的一个重要中心,

在著名的岳麓书院，朱熹与湖南的哲学家张栻探讨自己的中和理论。据导游介绍，现在还有朱张路。到了清代，这里成为一些文人（比如袁枚）所喜爱的地方。20世纪，现代革命家如黄兴、蔡锷和毛泽东经常光顾这里。我们短暂的长沙之旅选择这里作为终点，实在是很恰当的。

12:40，我们乘坐一架双引擎的小飞机前往昆明，途中在贵阳停留了30分钟，我们于下午5:50到达昆明。天气很好，怪不得昆明被称为“春城”。一队当地主人第二次到机场迎接我们，他们是云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席于馥亭先生、云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德光先生、云南省博物馆负责人张增祺先生、云南省外事办的王家寿先生和邓文庄先生。我们随后沿着绿树成荫的大街行驶，来到一家略有些旧、但很宏伟的宾馆。宾馆的地面是用云南著名的大理石铺成的。

晚饭后，我们在饭店里看了两部电影。第一部介绍植物研究所，影片展示了中缅边境中国境内丰富的亚热带植物和森林资源。第二部名叫《五朵金花》，讲述了一个健壮小伙子和一个美丽姑娘之间的爱情故事，他们两人都是云南的原住民。两部电影都拍于1950年代末。

11月6日，星期一，昆明

早8:30，我们动身去云南省博物馆。在那里受到张增祺先生和八位博物馆职工的接待，他们是熊瑛先生、阙勇先生、王大道先生、熊永忠先生、张瑛华先生、李伟卿先生、姜恒德先生和李荣先生。博物馆由文物组、图书馆、保存部和展出部组成。展出范围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到青铜时代。博物馆以藏有大量青铜鼓而知名。这些青铜鼓和广西的一起，已成为许多专题论文研究的对象。来自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著名遗址的青铜器样品正在展出。云南发现的青铜器很重要，因为它们代表滇地的非华夏文化。青铜工艺给我们的印象十分深刻。战国时期家畜（猪、狗、鸡、羊、母牛）的模型似乎说明滇人很早就过着定居的生活。其他的动物包括蛇、公牛、虎和野猪，特别是蛇和公牛。

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了石寨山发现的青铜鼓上。青铜鼓上描绘了大群的人和动物开战,人的祭品和蛇围绕着阴茎状的神坛。展览不包括汉代以后的人工制品。

从上午 10:30 到大约 12:00,我们和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在接待室里进行了讨论。讨论的话题包括:在滇文化中可能有蛇崇拜;滇文化与中国外的其他地域文化的关系,特别是与越南文化的关系;昆明一带政治和文化的汉化过程,等等。

下午,我们去了城西的西山,它濒临滇池。我们爬了许多很陡的阶梯,来到龙门。一条狭窄的过道从坚硬的岩石中劈出,一直通向靠近悬崖顶上的一座道观。在这个有利地势上,我们屏住呼吸,俯瞰山外的湖泊和田野。返回的路上,我们在一个名叫三清阁的平台上惬意地休息了一会儿,那里有茶供应。我们也参观了太华寺和华亭寺两个寺庙,华亭寺里巨大的佛像和五百罗汉保护得较好。

晚上,我们出席了于馥亭先生和省外事局副局长林涌一先生主持的宴会。

11 月 7 日,星期二,昆明至成都

早上,我们首先访问了两所大学。在云南大学,我们和以副校长赵季先生为首的教职工开了个会。(教职工都来自历史系,他们是方国瑜教授、尤中副教授、张德光教授兼系主任、马曜教授、蔡葵讲师和邹启宇副教授。)大学创立于 1922 年,现有 2,400 名学生和 650 名教师。云南大学有九个系,分为自然和人文两大学科。自然学科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地理,人文学科包括中文、外语(包括英语、俄语和法语)、历史和政治。在人文学科中,西南边疆民族史、云南现当代史、宋史、唐宋经济史、云南民族学和民间文学受到重视。历史系有 190 名学生和 45 名教师,有通史和云南少数民族史两个主要的专业。接着我们参观了历史阅览室,阅览室有 10,000 多册藏书,工作人员向我们展示了《中

国历史地图集》中的四卷(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八卷),这套地图集于1954年由地图出版社出版,只供内部交流。

接着,我们访问了昆明师范学院,它建在西南联大的原址上。我们受到两位副校长王云先生和卢俊先生的接待。学院最初作为联大的一部分,创立于1938年。1946年联大的三所大学(北大、清华和南开)各自返校后,学院扩大并占据整个校园。现在它有1,655名学生和400名教师。所有的建筑都是1946年以后修建的,只留下了一间前联大的教室作为纪念。最后,我们向闻一多表示敬意,结束了在这个校园的访问。由于政治的原因,闻一多这位著名学者和诗人1946年遭到国民党杀害,这儿有他的衣冠墓。联大为了纪念闻一多,1946年在闻一多衣冠墓旁立了一块纪念碑,碑文由冯友兰撰写。

从那里我们去了滇池旁的大观楼。大观楼最初建于1690年,现在成了一个美丽大公园里的主角。公园里有湖,有彩色的建筑。大观楼特别有名的是它的长联,上下联各180个字,它们珠联璧合。

下午3:00,我们乘坐英国制造的三叉戟离开昆明,一小时后在成都着陆。我们依然在机场遇到了我们的当地主人。他们是省社科院副院长林超先生、研究员杨伟立先生、历史所所长余南洲先生、省外事局的兰成章先生和陶西南小姐,以及省博物馆馆长谢雁翔先生。

晚上,我们被带去看一出川剧。这是一个典型的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有着快乐的结局,剧名为《御河桥》。主要剧情是男主人公在殿试中取得成功,观众们表现出非常满意的神情。

11月8日,星期三,成都

上午,我们去了四川大学。它是中国的一所一流大学。一到四川大学,我们就被引入一间大接待室,在那里我们与学校的管理者以及来自历史系、中文系和哲学系的教职工开了一个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校方成员有:副校长许琦之先生、历史系教授徐中舒先生、历史系教授缪

钺先生、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杨明照先生、中文系负责人赵迈生先生、哲学系讲师贾承先先生、历史系讲师罗世烈先生、历史系讲师马齐贤先生、校长办公室陈东明先生、人文学科部办公室负责人李安兰先生、校图书馆负责人曾双女士。通过副校长的简介和接下来的问答，我们可以了解到四川大学在汉代研究领域的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大致情况。

学校创建于1905年，1927年定名为四川大学。它分为人文和自然两大学科，总共有十个系。目前大约有1,200名教师和3,000名学生，其中大约300名教师和1,000名学生属于人文学科。人文学科有五个系，总共九个专业，它们是：

1. 中文系：一个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2. 历史系：一个历史学专业和一个考古学专业
3. 哲学系：一个哲学专业
4. 经济系：一个经济学专业和一个政治经济学专业
5. 外语系：英语、俄语和日语三个专业

历史系有61名教师（5名教授、1名副教授，其余为讲师）、450名学生（260人读的是最近恢复的四年制，其余读的是二年制）和11名研究生。历史学专业的必修课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进一步分为古代、中古、近代和当代）、政治、外语（英语或日语）和历史文选。考古学专业的必修课是中国通史、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考古学概论（进一步分为原始、奴隶和铁器时代）、古汉语和外语（英语或日语）。中国古代史专业有19名教师，考古专业有10名教师。一名历史系的学生头两年的时间将花在历史或考古的专业领域上。毕业课程才刚恢复，外语（英语或日语）受到强调，因此学生将能看得懂相关专业的国外文献。两年的学习之后，毕业生将参加教育实习或撰写一篇论文。此外，也提供纯人文学科、建筑学和田野考古方面的高级培训课。1,200名教职工可以划分为两类，有些人（占大多数）精力集中在教学上，有些人（大多数是超过了退休年龄的老教师）主要热衷于研究。我们中有几个人很高兴见到徐中舒教授（80岁）和缪钺教授（78岁）。徐中舒教授

是研究商周史的权威,缪钺教授是研究南北朝史的一流专家,缪是哈佛大学杨联陞教授的内兄和以前的老师。

1949 年以来,学校得到很大扩展。图书馆的占地面积由 30,000 平方米增加到 200,000 平方米,藏书从 200,000 册增加到 1,700,000。会后我们参观了图书馆。在那里,工作人员向我们展示了部分善本书籍,其中包括一套未出版的清代乾隆(1736—1795)年间四川城市和府县的彩色地图,一部 1613 年版的《三吴水利便览》(三吴即苏州、常州和湖州)。此书是最近在明代墓中发现的,我们得知,这可能是现存唯一的版本。①

最后,我们参观了学校博物馆。博物馆的面积有 1,000 平方米,展出分为五部分:历史文物、绘画书法、石刻(从汉到唐)、民间艺术和革命史料。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看了前三个部分。收藏品在表现四川地方文化方面,确实做得非常好,特别是雕刻和绘画艺术品。实际上这个博物馆属于华西大学,1949 年华西大学被解散之后,除了医学院,其余的并入四川大学。博物馆的专家非常慷慨地允许我们为人工制品拍照。

离开四川大学时,我们心中留下了一个印象:四川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最富活力的知识中心之一。

午饭后,我们去了省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以收藏汉代人工制品而出名,尤其是汉代的画像砖,画像砖描写了神话以及日常生活的景象。展品中也有新出土的文物,比如 1977 年从峨嵋县双福公社发掘出来的一组石雕。这些石雕比较大(18 至 24 英寸),是从淡红色的沙岩上凿下来的,表面有非常粗糙的纹理。另外还有用同一处岩石制作的灌溉田模型,模型分为三部分,也是出自峨嵋。新发现的几块石刻版印挂在墙上。经过副馆长的特许,我们可以拍摄其中的两块。其他有趣的人

① 见张勋燎《四川理县出土的一部明代水利著作——童时明的〈三吴水利便览〉》,《文物》1974 年第 4 期,页 76—77。

工制品包括一批珍贵的青铜武器和许多瓦当。

下午 4:00,我们离开博物馆,去参观著名的草堂,唐代伟大的诗人杜甫(712—770)曾在那里住过。由于安禄山的叛乱,759 年,诗人来到成都。他先住在成都郊区浣花溪的一个寺庙里。760 年春天,在他的堂兄弟和其他一些朋友的慷慨帮助下,他建了一所叫“草堂”的房子,在那里一直住到 763 年。因为在他的诗中多次提到草堂,所以草堂在中国文学史上永垂不朽。但我们参观的草堂是在清代重建的,是否建在诗人房屋的原址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早在南宋,陆游(1125—1210)就弄不清它的确切位置。尽管如此,可以稳妥地说,在杜甫的诗里,他的住所就在寺庙附近。我们所见的建筑和公园基本完成于 1800 年,但它们看起来保存完好。公园很美,到处是竹林、古树,山石艺术地点缀其间,鲜花(尤其是菊花)装饰着蜿蜒的小路——杜诗中提到的“花径”。后面是一个纪念厅,厅内展出着一个理想化的杜甫像,和它在一起的还有黄庭坚(1045—1105)和陆游的像。和杜甫一样,黄和陆多年旅居成都。

晚上 7:00,我们出席了当地主人在饭店举行的宴会。

11 月 9 日,星期四,去灌县参观

安排一整天参观灌县著名的都江堰灌溉工程。灌县位于成都西北六十公里处。上午 10:00 左右,我们到达伏龙观。旁边的水渠称为宝瓶口,传说在秦代蜀郡太守李冰(前 250 年左右在位)的指挥下,人们从坚硬的岩石中开凿出这条水渠,引岷江主河床的水灌溉农田。伏龙观的前厅里树立着李冰的纪念像,像的年代为公元 168 年,1974 年发现于河床里。工作人员为我们讲解了水利工程,彩灯连缀成的示意图不断地闪烁着,描绘着水渠和新灌溉区域的轮廓。目前,工程覆盖了以成都为中心的整个四川境内大约十分之一的土地。听完讲解,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了这个工程。在靠近宝瓶口的地方,有一个狭长的人工岛

将岷江劈成若干水道，一条水道用于灌溉。据说人工岛也是由李冰发起修建的。参观伏龙观后，我们乘车去靠近人工岛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吊桥，最初用竹子作为建筑材料，现在代之以钢丝绳。从桥上看灌溉工程，看得更清楚。最后，我们探访了二王庙。这是一座宏伟的复合式建筑，建在美丽如画的岷江南岸陡峭的山腰上。“二王”指的是李冰和他的第二个儿子“二郎”，但这是一个历史与神话混和的典型。在最早的资料（如《华阳国志》中的《河渠志》）中，没有一处提到李冰的儿子协助他修建这个灌溉工程，直到南宋才有学者（如朱熹）开始谈到李冰的儿子。现代学者令人信服地说明二郎是来历不明的神话人物，很可能是羌人或氐人的牧羊神。然而在家喻户晓的传说（如《封神演义》）里，二郎不姓李而姓杨。在唐宋之际，他摇身一变，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师和管理者。[①]

二王庙周围环境优美，岷江和青城山壮丽的景色尽在眼前。我们坐在阳台上喝着茶，四周一片宁静。我们出去的时候，看见当代李冰和二郎的新塑像以革命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经过询问我们得知，在“文革”中，这两座塑像和其他寺庙里的塑像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参观了二王庙，我们乘车去灌县“革命委员会”，那里已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厨师在当地很有名，曾为多年以前参观此地的毛泽东主席掌勺。

回成都的途中，我们在城郊的武侯祠停留了一下。武侯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从杜甫的一首诗里可以清楚地知道。现在的建筑建于 1672 年。祠内有大量清代的塑像，包括了刘备朝中所有重要的文臣武将，也就是武侯诸葛亮（181—234）的同事。武侯祠的旁边是刘备的惠陵。但我们的当地导游不能完全确定刘备确实埋在这里。最初这里是刘备昭烈庙原址。但不久武侯祠建在它旁边，皇帝逐渐被丞相的名

① 见李思纯《灌口氏神考》，《江村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与之有关的不同意见，见黄芝岗《中国的水神》第 4 章，上海生活书店，1934 年；杨向奎《李冰与二郎神》，《责善半月刊》1940 年第 19 期，第 1 卷。

声所掩盖,如今昭烈庙的名字已无可救药地被人遗忘。

11 月 10 日,星期五,成都至北京

离开成都前,代表团的部分成员欣赏了田园风光,一名成员陪罗伊去原华西大学看他在战争时期的房子,有几个人在城里逛街和购物,杜尔回到四川大学和历史学家们交谈。

按原先的旅行路线,代表团将分成两组,一组去北京;一组飞往南京,在那里呆两三天。然而,两天前就知道没有成都飞往南京的机票了。于是决定全团人员在当天前往北京。由于飞机延迟,当我们在北京饭店改建了的西厢房住下时,已过了午夜。

11 月 11—17 日,北京

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我们的主要时间用在与中国学者探讨问题,或参观与研究兴趣有关的地方上。活动单独进行或分小组进行,这是我们大家所希望的,因为代表团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学科,并且除了对汉代的共同兴趣外,研究的是不同方面的中国史。下面只记录了部分活动。

11 月 12 日,列在我们早晨时间表上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周恩来生平事迹展。午饭后,我们又很快地参观了毛泽东纪念堂。从那里我们乘车去天坛。

11 月 13 日上午,梅侨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席泽宗博士会谈了两个小时。席博士讲述了一些从事汉以前和汉代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学者的工作情况。他们从中国古代科学史的角度,讨论了马王堆 3 号墓出土的帛书,特别讨论了天文学、阴阳五行的宇宙论,以及同一个墓里发现的六博棋盘所暗示的宇宙观。席博士也提到最近在湖北省所发现的另一个楚国重要文物,初步的报告将在近期的《文物》

上发表。最后,席博士介绍了所里的编制和研究工作,并透露《天文学史期刊》即将创刊的消息。

下午,黎格、布格和梅侨去北京大学和朱德熙教授交谈。朱德熙介绍了马王堆研究小组的构成情况,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将帛书中的古文字转化为现代字,并誊写下来,但不研究内容。所以小组成员的专业主要包括语言学、古文字学和历史学,不包括哲学史。朱博士接着谈到马王堆帛书的字体,其中有些是篆书,有些是隶书。这说明在帛书抄写的时代里,篆书还未被很好地理解,一些帛书将篆书转化为隶书抄写下来。根据朱的观点,这是不必要的,因为隶书是楚地的字体,而篆书是北方的字体。战国时期楚地也使用篆书,虽然在形式上与北方的不同,楚地的篆书多变、不规则,难以辨认。他认为这是年代的问题。秦统一中国后,篆书被隶书取代,而在马王堆墓尸体下葬时,篆书已停用。

比伦斯坦和布德去了香山公园、碧云寺和卧佛寺,花了一天时间。

晚上,代表团观看了郭沫若改编的历史剧《蔡文姬》,戏的舞台布景很豪华。

11月14日,代表团中的大多数成员用一天时间游览了长城和明代皇陵,杜尔留在北京和历史所的史学家们交谈。我们参观的那段长城位于八达岭,那里距北京有两小时车程。我们攀登和拍照,呆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中午,我们在古代商道上的关口居庸关停留了一下。这个地方最有趣的景点是元代修建的一个牌楼,牌楼有显眼的石浮雕以及由蒙、汉、藏、回鹘和突厥几种文字组成的石刻铭文。日本和西方专家对此铭文有翻译和研究。[①] 我们在永乐皇帝(1402—1424)长陵门外的接待厅里吃了盒饭。长陵还未被挖掘。游览了长陵之后,我们来到万历皇帝(1572—1619)的陵墓。这个陵墓已被挖掘。我们首先参观地面上的展厅,看了金银器、木雕、衣服、皇冠和其他的物品。接着走进墓室,参观了皇帝和他两个妻子的棺木,棺木很大,是复制品。5:20,我们

① 见村田治郎《居庸关》,2卷本,京都,1957年。

回到饭店。晚饭后，我们被带去看京剧《霸王别姬》和《挑滑车》。两个节目都以传统的古典形式演出，可见中国的剧院似已终于从江青的八个革命现代样板京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

11 月 15 日一整天，应我们主人的邀请，代表团在饭店里向大约六十位中国学者讲述了美国汉代研究的状况。大多数听众来自中国社科院，也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文物局的学者。会议由夏鼐与美国方面的余英时（上午）和张光直（下午）主持。余英时首先介绍了美国在这一领域里研究的概况，包括招募人员、基金、资料分布、出版等等。接着代表团其余成员报告了各自研究所里的工作情况。听众似乎听得很专注，但提问很有限。

晚上，代表团在北京烤鸭店举行了答谢宴会，感谢中国主人的殷勤接待。于光远先生是宴会的嘉宾，唐兰教授和瞿同祖教授也出席了宴会。

11 月 16 日，代表团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去了颐和园。

11 月 17 日下午，代表团分两组离开中国。比伦斯坦、黎格、罗伊去广东和香港，其余的人乘日本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东京。

（据“Daily Activities and Disscussions,” in Ying-Shih, ed., *Early Chinese Histo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port of the Han Dynasty Studies Delegation October-November* 1978. Seattl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1, pp. 19-68 译出。）

编者附注：关于汉代研究访华团及其报告的说明

这是余英时先生作为 1978 年美国汉代研究访问中国代表团团长执笔写的总报告，以及代表团每日活动和讨论的分报告。

负责组织、协调并全程随行这次访问的美国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官员特安吉利思（Alexander DeAngelis）在整个报告的前言讲，随着 1972 年中美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后，中美学术交流开始进行。但由于机构与政策各方面原

因，学术交流主要限于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很少。1977 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极大地促进了中美之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交流，1977 年冬天，中国社科院已同意邀请首批非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代表团到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组织了这个汉代研究代表团在 1978 年秋天访问中国，为期月余。

汉代研究代表团以公元前 300 年到公元 300 年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为关注范围，但为了考察整个“汉世”的历程，所以在时间上有所超出汉代（前 206—前 220）。

代表团共 12 人，名单如下：

Ying-shih Yu 余英时，团长

Department of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onnecticut

Hans Frankel 法兰克，副团长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onnecticut

以下以姓氏字母为序：

Patricia Berger 布格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lifornia

Johann (Hans) Bielenstein 比伦斯坦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New York

Derk Bodde 布德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Kwang-chih Chang 张光直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Peabody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Jack Dull 杜尔

China Program,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Washington

John S. Major 梅侨

Department of History, Dartmouth College, Hanover, New Hampshire

Jeffrey Riegel 黎格

Project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Stanford-Berkeley Joint East Asia Languages and Area Cen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lifornia

David Roy 罗伊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linois

Douglas Spelman 斯佩曼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D. C.

Alexander P. DeAngelis 特安吉利思，秘书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整个报告分为六章：

第一章，由余英时执笔，标题是《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概括地反映了正当他们访问时中国知识界的氛围，并为后面的报告定了基调。在这一章里，余教授探讨了知识界掀起的以"反历史影射运动"和"思想解放"为主题的重要思潮，并联系了他个人与历史学家的谈话以及自己的观察。

第二章是一份有关代表团活动、考察和讨论的逐日报告。代表团的每个成员交出他或她的单独活动的报告，由余英时将这些报告融入全面的总结和日记里。此外，为了向西方学术界更仔细、全面地介绍中国学者的研究，余英时以有关"汉世"的出版物和理论为背景，将访问中收集到的信息写进报告中，所引用和参考的二百多种原始材料和研究成果，大部分是中国的。

其余几章分别是：

第三章，杜尔，《与汉史历史学家的讨论》

第四章，张光直，《考古学》

第五章，梅侨，《博物馆和科学史研究》

最后还有四个附录：

1. 中国历代纪元表
2. 代表团活动日程表
3. 代表团所见到的中国学者与行政人员名单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所机构与领导

3．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①]（1982年）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史学一向是最光辉的一门学问。但时至今日,史学在中国竟大为衰落了。必须指出,现代中国史学的衰落并不是一个孤立而突出的现象;实际上它只是整个学术荒芜的一个环节而已。在过去五六十年中,撇开自然科学不说,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都不曾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而最能够提高一般人的思想水平的哲学在研究与教学方面也始终停留在起步的阶段。史学为综合贯通之学,必须不断而广泛地从其他学科中吸取养料。在这种情形下,现代中国史学之不振可以说是毫不奇怪的。但是比较而言,由于传统凭藉的深厚,在现代中国的一切学科之中,史学仍不失为较有成绩的一支。

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先后曾出现过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有两派:第一派可称之为"史料学派",乃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第二派可称之为"史观学派",乃

① 原编注:本文译自一批青年史学工作者独立刊行的《史学评论》(台北,1979年7月)的"代发刊词"。此文采用了他们的论点,并初以为"发刊词"的,故称以"我们"。但是本文既由余教授执笔,便不必然反映刊物编者的所有观点,故决定以作者个人的名义发表而标以"代发刊词"。英文中的小标题系译者加上的。

编按,在英译本附语中,余英时先生对该文的英译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同时表示,他意识到汉语写作完全转换成英文时,有些话便不必讲,许多话换种表达会更贴切,因此在英文发表时他作了删节和部分改写,并加上了全部注释。编者将此文收入本汉译集时,相同部分照引中文原作,不同部分则据英文本译出。

以系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主要任务。从理论上说,这两派其实各自掌握到了现代史学的一个层面:史料学是史学的下层基础,而史观则是上层建构。没有基础,史学无从开始;没有建构,史学终不算完成。所以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的。但是在实践中,中国现代的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由于各趋极端,竟不幸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史料学派鄙史观为空中楼阁,而史观学派则又讥史料学为支离破碎,不认大体。

我们不能在此对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的得失展开全面的评论,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两派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所产生的某些流弊依然在泛滥中。因此对这些流弊略加检讨,以为今后史学发展的借鉴,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3.1 史学中的客观与主观

史料学派的最大特色在于他们的史学和时代完全脱节。主要由于他们对于史学上所谓“客观性”的问题的了解有其局限性,他们假定历史事实是百分之百的客观的,可以通过科学的考证而还原到“本来面目”。如果一切事实都考证清楚了,那么全部的历史真相自然会显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乐观地等待着“最后的历史”(ultimate history)的出现。正是根据这一假定,史料学派才否认史学和时代之间有任何关联。这一学派的人深信,纯粹客观的史实既能通过一定的考证程序而恢复其“本来面目”,则史学家因自身所处的时代而产生的一切主观因素都已被摒除在史学之外了。

我们承认,有些所谓历史考证的工作,其具体结论的正确与否的确是不受时代影响的,如名物制度、训诂校勘、地理沿革、人物生卒等种种方面的具体问题,一旦获得了正解,便再也不会随着时代而更动。但是这一类的考证虽然都涉及史学家所必备的基本事实(basic facts),却不

足以当"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之称,[1] 因为这些基本事实只不过给历史提供了一套外在的架构,它们本身并没有内在的意义,即不能说明历史的变化,而且即使是这一类的考证,其兴起与发展仍不能完全脱离时代。我们不免要追问:史学家何以在某一个时代对某一类的名物、制度、典籍、人物、地理发生了特别的考证兴趣呢?

史料学派不但误认一切基本事实为历史事实,而且对每一事实复尽量作孤立的处置。因此他们主张"证"而不"疏"。在"史学即史料学"的理论支配之下,他们的"证"的范围则退缩到材料的真伪这一点上。在这种情形下,真正的史学研究是无从开始的。近几十年来史学的一般发展使我们认识到,历史事实之所以成为历史事实,是和史学家对它的了解分不开的。历史事实无穷;相对于任何一项历史上的变化与发展而言,史学家经过反复的研讨,才在众多的历史事实之中发现它们之间主从轻重的复杂关系。发现这种关系便是对历史现象作出了最卓越的解释。《书经》所谓"疏通知远",司马迁称《史记》的目的在"通古今之变",其中心的涵义即在于是。所以我们虽然同情史料学派对"证"的强调,但是却绝不以此为史学的止境。今天的史学家一方面要用最严格的实证方法来建立史料,另一方面则要通过现代各种学科的最新成果和时代的眼光来"疏通"史实与史实之间的关系。

由于观点的不同,史学家在疏通的工作上常不免有见仁见智之异。对于同一历史的变动,史学家根据他们对史实本身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往往提出不同的解释(explanation)。这是史学发展的常态。历史的解释不但因时代而变,而且即使在同一时代也纷然杂陈,不易归于一是。无论是异代还是同时,总之史学是脱离不了时代的。每一时代都有其独特的问题,史学家的注意力便随着时代的问题而不断地转移其方向,并且一般学术研究的日新月异也足以逐渐加深史学家

---

① 我这是借用了 E. H. Carr 的两个术语,见他的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1962 年,页 7-11。

对同一史实的理解。例如鲁宣公十五年(前 594)“初税亩”,是一件重要的历史事实,《春秋》三传都会着重地加以评论;后世制度史家也都注意它。但是这件事的意义一直要到现代社会经济史学发展到相当高度之后,史学家才能结合其他相关的史实加以充分的发挥。而社会经济史学之兴起正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之所在。

史学与时俱变,史学家的解释也往往互有出入,那么历史究竟有没有客观性呢? 其实历史的客观性是根本不容怀疑的。史学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只有使历史的客观面貌越来越清楚。“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庐山的真面目即客观地存在于游人的四面八方的观赏之中。我们决不能因此认为,庐山客观地具有无数的面目,或根本没有任何面目。两千年前,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两句话早已接触到了史学上客观或主观问题的核心。“古今之变”是客观的历史;而司马迁用他的“一家之言”来“疏通”“古今之变”则是史学家的主观解释。但是对《史记》而言,司马迁的主观解释不但丝毫无损于历史的客观,反倒照明了“古今之变”。

司马迁自称其书为“一家之言”,班固虽不同意他的观点,却也不能不承认《史记》是“实录”。这正是由于《史记》的疏通工作是建立在史料考订的坚固基础之上,即所谓“网罗天下佚失旧闻,考之行事”。[①] 所以《史记》是中国史学传统中“疏”与“证”结合,主观与容观交融的一个最成功的范例。而司马迁之所以能有此辉煌的成就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一种极深刻的感受。班固批评《史记》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②] 其实这些地方正显出了司马迁的“良史之材”。他撰史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世,但朝廷的功令并不能使他无视于当时在文化、社会方面十分活跃而为大一统的政

---

① 见《报任安书》,《汉书》,第 6 册,页 2735,中华书局,1962 年;参见 Burton Watson, *Ssu-ma Ch' 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页 66。

② 见《汉书》,第 6 册,页 2737—2738;参见 Waston,同上,页 68。

府所不喜的种种力量。《史记》着重地记载了黄老、游侠、商贾的活动，一方面这是作者“一家之言”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也恰好是作者时代的忠实反映。史学的主观与客观在这里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

3.2 “历史规律”与时代需要

如果说史料学派的特色是史学与时代的脱节，那么史观学派的特色则恰好相反，即史学与时代结合得过分密切，有时竟达到古今不分的地步。这两派之所以如此背道而驰是和他们对待史学的态度分不开的。史料学派是“为史学而史学”的，根本不考虑他们认为与史学无关的任何外在因素，包括所谓“时代”在内。因此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考证一件件孤立的史实。近代中国的史观学派则自始便不是从纯学术的立场来研究历史的。他们的史学主要是为现实服务的，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为他们所从事的政治运动寻找历史根据的。必须指出，这种态度本身是绝对无可指责的；相反的，一个人如果真是从爱国家、爱民族的纯洁动机去治史，这正是表现了一种高贵的道德情操。晚清许多史学家如章太炎、梁启超便曾从排满、革命的观点对中国的历史下过不少重要的论断。所以我们所说的史观学派在中国已有很长的一个发展阶段，决不限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过在今天，我们检讨中国的史观学派自然不能不以唯物史观为主要对象。

史观学派因为完全从现实政治的要求出发，最后必然地模糊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界线，并从而否定了历史的客观性，为应付眼前需要所写出来的历史，虽然表面上是在分析过去，但实质上则处处是影射现在。这样一来，历史就变成了一个任人予取予求的事实仓库，它本身已没有什么客观演变的过程可言了。而且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又是和政治任务的迫切性成比例的：当任务最迫切的时候，史学上的一切求知的戒律都将被弃置不顾了。过去几年中，在中国大陆上占据着统治地位

的所谓“影射史学”便是史观学派最极端的一种发展。[①]

一方面,对于史学应当配合时代这种观点,我们基本上是同情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则强调,史学和现实之间又必须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史学对我们可以有启示、有昭戒,然而并不能直接为现实服务。史学作为一门学术而言是有其纪律和尊严的;破坏了这个纪律不仅毁灭了史学,而且也混乱了现实。以自然科学为例,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它的基础研究、理论研究,这是科学之纪律的基本要求。我们当然希望这种基础研究最后可以发生实际的效用,但是我们决不能为了急于求实用之故而去干扰科学的纪律,史学研究也完全是一样的。没有基础研究,史学便根本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学术。至于这种研究到底何时发生效用,如何发生效用,以及发生何种效用,则是无法预知的。唯一可知的是,史学研究和一切科学研究一样,如果针对着时代的需要而善为规划,其结果绝不会是完全无用的。

从理论方面看,史观学派也有其基本困难。我们在前面曾分析了史料学派对史学上客观性问题认识不足。现在我们要指出,史观学派,特别是唯物史观,对于历史上所谓“规律”(laws)的问题缺乏清楚的交代。史观学派的史学基本上是担负着支持政治运动的任务的。而史学所能给予任何政治运动的最有力的支持,莫过于宣告这个运动是代表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样的说法最足以瓦解反对者的抗拒意志。这和中国历史上王朝所宣扬的“奉天承运”的天命论,实际上是有着同样的作用。但是今天是科学的时代,天命论早已破产了,只有科学才有无可抗拒的说服力量。“历史潮流论”便正是以科学必然性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必然论”建筑在“历史规律”的基础之上。一种历史潮流之所以被视为不可抗拒是因为它遵循着历史发展的规律。自然界的一切运行必然遵守自然规律,这一点已为近代科学所证明,无可置疑。如果历史发

① 参见拙文《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编按:已收入本册。

展也有它的规律，而这些规律又已在史学上完全获得了证实，那么依照着这种规律而运行的历史潮流自然也是无可抗拒的。现在让我以唯物史观为例来检查一下"规律"这个概念的确切意义。

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有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具有"规律"的涵义，或者说是被马克思主义者着重地当作"规律"来宣扬的：第一、在纵的发展方面，人类社会必然经历五个阶段，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第二、在横的结构方面，物质生活中的生产方式是下层基础，决定着政治、社会、文化等上层建筑。

就第一点说，马克思的五阶段论是他观察西欧历史所获得的一种综合看法，他自己并不承认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通规律。当他的追随者要把他的理论应用于俄国的时候，他立刻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明白地指出，西欧的特殊历史经验不能转化为一般性的历史哲学学说，以为一切民族都必然经过同样的历程。他更进一步说，凡是把一般性的历史哲学学说当作万灵方的人都不可能了解历史，因为这种学说在本质上是超历史的(supra-historical)。[①] 正是因为当时的追随者滥用他的历史理论，马克思才愤然地用法语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既然马克思自己坚持他的历史理论仅限于西欧一隅，则这个历史阶段论当然不可能具有科学规律的普遍意义。

关于第二点，马克思的确是当作一种普遍规律来陈述的。但是根据现代哲学家的分析，生产方式和所谓"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仍然有欠明确，远不能与科学上严格意义的"规律"相提并论。如果每一个时代的上层建筑如哲学、艺术、宗教等是被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么一种生产方式最多只能决定一种哲学、一种艺术、一种宗教。然而事实上，每一时代都有多种哲学、艺术、宗教。究竟其中哪一种哲学、艺术、宗教

① 见马克思的"Reply to Mikhailovsky,"(1877) 收入 David McLella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 Aharper Torchbook, 1971 年，页 135—136。

才算是典型的呢？其余非典型的又是被什么物质基础决定的呢？所谓"决定",又有什么确切的意义呢？像这些问题,在唯物史观中并没有得到基本地澄清。一般地说,唯物史观强调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是一个深刻的观察,这一点特别对现代史学、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尚没有足够的理由把这种联系转化为精确的规律。事实上,恩格斯在晚年对这一点已有所修正。他在 1890 年 9 月 21 日致布洛赫(Joseph Bloch)的信中说道:

>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把这个说法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①]

所以根据恩格斯的晚年定论,上述唯物史观的第二点也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规律的资格。

3.3 基于西方经验的模式

史观学派在近代中国史学方面还投下了另一种消极的影响,即以西方历史发展的抽象模式来笼罩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上述马克思主义者的五阶段论即是一个例子。这种风气并不限于唯物史观一派。例如一度最为流行的分期法,把中国史划分为上古、中古和近代三个阶段,便显而易见地是西洋史在中国的翻版。日本的内藤虎次郎曾以宋代与文艺复兴相比附,断为中国近代史之始;这个"内藤说"虽然已力求照顾到中国史发展的特点,其基本模式则依然是西方的。

规律和模式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假定之上,那便是世界上各民族

① 见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rrespondence, 1846—1895*,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4 年, 页 475。

都经过一个普遍的社会发展的历程。关于这个假定,我们可以分别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来看。理论上说,我们现在对这个假定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目前一般分析哲学家和职业史学家,因为鉴于"玄想的历史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困难重重,颇有从理论上排斥这个假定的倾向。我们认为这样的否定态度只能看作是现阶段心理挫折的一种反应,而不是"此路不通"的确定表示。史学在各国的发展情况目前极不平衡,而比较史学更是距成熟之境尚远;总之,我们还没有到能够心安理得地下断语的时候。

就实际的研究成绩说,由于西方的史学和一般社会科学较为发达的缘故,一般人往往把从西方历史经验中观察得来的论断当作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或典型模式。资本主义究竟是不是每一个社会发展所必经的一个阶段呢? 严格地说,西欧是唯一的历史例证(美国则是西欧的延长);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谨慎态度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一两个例证当然产生不出普遍性的规律,也不成其为典型。罗素曾不很认真地说过:"中国似乎是一切原则的例外。"即使这句话是真的,恐怕问题也不在中国而在原则。罗素所指的当然是从西方经验中所归纳出来的原则。

但是中国不可能真是一切原则的例外。我们引罗素的戏言,其意仅在提醒史学家! 任何有关寻求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规律的努力首先便不可离开中国的历史经验。史观学派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对规律或模式的执著,而是在于他们对"规律"这一在科学上具有严格意义的概念体认得不够真切,他们将西方历史上一些局部有效的概括性论断(generalization)错误地看成了普通性的历史规律。因此他们的史学工作主要不是在丰富的历史经验中寻求中国文化发展的型式(pattern),而是运用中国的经验来适应西方的理论。这种以西方模式笼罩中国经验的态度激发了认同中国传统价值的历史学家强烈的民族感情。在他们看来,奉西方为楷模是在心理上彻底向西方文化投降的表示。一部分人甚至怀疑我们究竟是否有接受西方史学的必要。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

虽然比西方落后,但史学一向自成系统而甚有光辉,有什么理由唯西方是从呢?

我们很同情这种民族自尊感,但是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却不如此简单。"模式"、"规律"的吸引力并不单纯地因为它们起源于西方;更是因为它们打着科学的旗号。自19世纪以来,科学具有无比的权威性,史学一直处于科学的压力之下。时至今日西方实证论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认为史学只管事实的考证与整理而理论则应划归社会科学者,依然大有人在。西方比较保守的史学家对这种挑战同样感到难以应付。我们可以说,近三十年来西方批评的历史哲学(cri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运动便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历史知识的性质构成了这个运动的核心问题。近年来强调必须理解历史解释的柯林伍德派(Collingwoodian)和解释理论(Hermeneutic theories)的影响渐大也是基于这一背景。所以分析到最后,这是现代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一场有关基本性质的争论。我们决不能把它误解为西方理论与中国事实之间的对立,并从而在史学研究上激发过度的民族情绪。

3.4 超越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的实证主义限制

以上我们重点就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的理论与实际作了一些疏解。通过这些疏解,我们大体上可以了解近代中国史学的主要趋势及其症结所在。但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批判过去,更不是否定20世纪初叶以来中国史学研究的全部成绩。今天的历史思考已达到一个新的成熟水平,到了重新审视的时候了。为了推动今后中国史学的发展,我们不能不对以往所经历的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一番深彻的反省。反省是新旅程的开始。

无论我们在今天怎样不满意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他们所留下来的研究业绩终究是不可废的,并且将成为今后中国史学发展的基点。科学的发展必须站在巨人的肩上,史学也不例外。纵使近代中国史学

史上只有常人而无巨人,我们也必须先踏上这些常人的肩头才能看清楚前面的道路。事实上,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在史学上各有其坚强的立足点。从上面的疏解可以看出,这两派尽管在观点上都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但它们立论的核心则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换句话说,即是与史学俱来的基本要素。正如我们在本文之始便已指出的,史料与史观同为史学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就思想的渊源言,中国史学的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分别植根于史学追求科学化的两个途径。我们已指出史观学派的"规律"和"模式"是从科学方面移植过来的;另一方面,史料学派之注重"原料"与"事实"也同样是奉科学为模范的。在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看来,所有的自然科学都必须始于原料的收集和事实的建立。我们知道,在实证主义者那里,事实与规律具有共生的关系,前者的探明必然导向后者的发现。大体言之,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史学家却各持一端而分成截然对立的两个阵营。一方面,兰克(Leopold von Ranke)文献考证的方法论后来演变为"科学的史学"(Scientific history),另一方面,兰普勒赫(Karl Lamprecht)领导着反兰克派的寻求历史规律的运动。(兰克是否真的是"科学的史学"的奠基人,抑或仍属于德国唯理主义的传统,当然也还是一个问题,只是这里我们不需要关心。)中国的两派对立,比较接近德国的这个情况。事实表明,史观学派极大地借用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精神遗产,而史料学派对兰克学派的智识接受也决不少于对清代考证传统的继承。对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互相排斥的状态有所指摘,并不意味着我们想要做调解人。相信用兰克的"科学方法"可以发现兰普勒赫所强调的普遍的历史规律,那是乐观而天真的想法。我们所相信的是,对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我们现在能够超越实证主义式的认识。不容置疑的是,在现代世界克莱奥(Clio)这位历史女神已稳步地赢得了科学的尊重而无须成为"赛先生"。一旦我们突破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的实证主义窠臼,我们所期待于中国史学的展望也将是不同的。带着这样的认识,我们愿意提出以下几点卑之无甚高论的观察:

第一,我们一开始就说史学是一种综合贯通之学,必须从其他相关的各种学科中吸取养料。现在我们应该对这句话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解释。与史学直接、间接有关的学问无数,从过去的训诂、语言,到今天的各种社会科学以及某些自然科学都可以和史学扯得上关系。但是在学术日益成熟和专业化的今天,我们岂能要求史学家尽通一切学术之后再来治史?事实上,有些必须经过专门训练才能研究的专史早已脱离了一般史学的范围。例如,严格意义的经济史已成为经济学而非历史学的一个旁支;而科学史更是已经完全独立了。所以我们所说的"综合贯通",不过是指史学家在研究某一时代历史事象时不但一方面要照顾到该事象在其前后时代中的纵的线索,而且另一方面还要考察它与其同时代一切有关的事象之间的各种可能的横的关系。这和社会科学家之在同一类事象中求其抽象的通则或根据某种已知的通则研究某一类事象者,迥不相同。例如史学家研究南北朝门第制度时,他既要考其前后的流变,又要把它贯穿在当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种种的条件关系之中去进行比较全面的了解。他所做的工作是和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之研究门第的亲属系统者绝不相同。史学家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亲属系统的问题,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所注意的一些问题,但他只是从史学的需要上去"涉及"社会科学的某些有关的部分而已。他毋需乎对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去作系统的研究。任何一个在近代学术方面受过基本训练的史学家都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正如一个社会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涉及某一时代的历史背景时,他只要参考有关的基本史学著作就够了,而不必亲自动手去考证那个时代的历史。其实,这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所早已接触到的博与约、通与专的问题,章学诚说得好:"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①] 所以史学家究竟需要那些方面的辅助知识是因人而异的,要看研究范围的"切己"情况而定。

① 见《文史通义·假年》,古籍出版社,1956年,页190。

3.5 中国史学家理解的“方法”

第二，我们要谈一谈方法论的问题。中国的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都非常重视方法并强调他们所持的方法是最新的科学方法。因此近代中国的史学界一直流行着一种观念，即史学的进步主要是靠史学方法的进步。这个看法当然是有相当的道理的。但是什么是史学方法呢?这一点似乎大家并没有追问到底。

我们细察近代中国史学家所说的方法，发现它具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涵义。第一层是把史学方法看作一般的科学方法在史学研究方面的引申。已故胡适博士“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句著名的口号便属于这一类。[①] “假设”说的流行起于 1902 年法国数学家庞迦瑞(Henri Poincaré)的《假设与科学》一书。“规律”含有不可改变的意味，庞氏以“假设”代之，可以消除这种误会，因为科学上所谓“规律”则往往为新发现的事实所推翻。这一观念上的改变当然也影响到社会学和史学；19世纪所谓“社会发展的规律”或“历史规律”包括唯物史观在内，在今天看来都只能算是“假设”了。但无论是“规律”还是“假设”，总之都不能算是史学本身所独有的方法。

“方法”的第二层涵义是指各种专门学科中的分析技术，如天文、地质、考古、生物等各种科学中的具体方法都可以帮助历史问题的解决。但这些显然更不是史学的独特方法了。其实即使是与传统史学关系最深的一些方法，如文献学的、训诂学的之类，严格地说，也不能迳视之为史学的方法。一个专门辨伪的人是文献学家而不是史学家，虽则史学家有时也必须从事某种程度的辨伪工作。我们不难想像有一种情况，特别是在近代史或现代史的研究方面，史学家可以不遇到什么严重的

① 见 Hu Shih, “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Method in Chinese Philosophy,” 收入 Charles A. Moore 编 *Philosophy and Culture——East and West*, Honolulu, 1962 年, 页 221。

辨伪问题,更完全不发生任何训诂的问题。史学家当然也有他独特的一套工作程序,如确定证据,建立史实,发现史实与史实之间的关系,解释变化等等,但是这些工作却是与其他学术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新学术的兴起有时开拓了史学家的视野,使他对"证据"、"史实"有新的了解。以前不是"证据"、"史实"的,现在则变成极重要的"证据"、"史实"了。近几十年来西方"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的流行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我们这样分析并不是要证明史学没有方法论;我们只是要指出,史学的确没有固定的方法;在技术层面上,史学是在不断地吸收其他有关科学的方法以为己用的。这一点正和我们前面所说史学的综合贯通性格相应。那么史学无定法,是不是表示史学完全依附于其他科学,因而失去了独立自主呢?这种忧虑其实是多余的。正如主张以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最力的贝克霍夫(Robert F. Berkhofer, Jr.)所指出的,史学家在历史时间的系统之内尽可能地从整体的观点(holistically)来研究人类的过去,这就使得他"在目的与方法两方面都和社会科学家分道扬镳了"。[1]

然而"为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我们一方面虽然主张史学必须不断地吸收新方法,但另一方面则要郑重提出警告:千万不可迷信方法。从经验科学中发展出来的方法都有它使用的际限;彼此借用之际一定要考虑到因经验对象相异所产生的不同效果。而新方法则尤其需要高明的行家通过反复的试验才能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心理史学"上最成功的著作便是心理学家而不是史学家写的。到现在为止,"心理史学"的失败之作远多于成功之作,最近巴森(Jacques Barzun)对于"心理史学"的偏向发展特别提出严正的批评;这对史学家在方法上

[1] 见 Robert F. Berkhofer, Jr., *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69, 特别是页 265—267。

过分趋新的风气真不失为最有力的纠正。[①]

史无定法，而任何新方法的使用又隐藏着无数的陷阱；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在史学研究上没有捷径可走，一切都要靠史学家自己去辛苦而耐心地摸索。这种情况并不自今日始，可以说是自古已然。一个世纪以前，蒙森(Theodor Mommsen)就说过："如果一位史学教授认为他能像训练经典学者和数学家一样训练史学家，那么就是处在一种危险而有害的错觉之中。史学家是别人不能训练得出来的，他只有自己训练自己。"[②] 这真是有关史学方法的证道之言。史学的困难在此，但史学的吸引力也在此。

3.6 中国文化的基本型态

第三，我们一方面不取史观学派所持"规律"之说，另一方面也不满意史料学派的琐碎割裂，那么我们对于今后中国的史学，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我们又究竟该走什么道路呢？关于第一点，用最简单的话说，我们希望史学研究可以逐渐使我们从多方面去认清中国文化的基本型态及其发展的过程；我们同时更希望这种对过去的确切了解可以照明我们今天的历史处境。

不可讳言，在我们这样说明对于今后史学研究的期待时，我们已经肯定了一些东西。首先我们肯定文化是有型态(Pattern)可言的，而中国文化则具有它的独特型态。这一点虽然现在已是多数学者，特别是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所共同接受的一个假设，但仍有强调的必要。因为在西方模式笼罩之下，中国以前颇有人主张中、西文化的不同不在型态而在历史的阶段，即西方已进入近代而中国尚停留在中古时

① 见 Jacques Barzun, Clio and the Doctors, *Psycho-History and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年。

② 见他的"Rectorial Address," 英译文收入 Fritz Stern 编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A Meriden Book, 1956 年，页 193。

代。即使在今天,这一观念也依然很有势力,唯物史观的中国历史分期便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其次,我们肯定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就是说,历史并不是无数彼此不相关联的事实碎片的偶然集结,而是具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性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则表现为史学家所说的趋向、趋势或潮流;用中国传统史学的名词说,便是"势"。但是在我们所说的趋势或潮流的后面却不存在任何"上帝的计划"、"理性"、或"规律"这一类至少目前尚无法证明或反证的假定。因此我们不能断定历史上的趋势或潮流是否"不可避免"或"不可抗拒"。我们只相信,通过史学研究,历史上的趋势或潮流是能够被发现并得到合理的解释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都有基本的分歧。最后,我们肯定在古与今、过去与现在(包括某种限度的未来)之间是相通的;这一肯定的最重要的根据之一便是刚才提到的历史的连续性。我们强调史学与时代之间必须维持一种适当的关系,主要也还是着眼于此。中国的现在当然不完全是中国的过去所单独决定的,但中国文化的独特形态及其发展过程所造成的"势"的确是使中国进入目前这种状态的一股主要动力,而且余"势"未衰,还在继续推动我们朝前面走。今天许多史学家已不再相信鉴往可以知来;严格科学意义的预言也诚然不在史学的范围之内。但是史学家通过精辟的研究使我们认清这种"势"的性质与作用,对我们眼前的处境有指点方向之功。第二次大战期间,法国中古史大师布洛赫(Marc Bloch)亲历 1940 年法国陷落之痛,以无比的悲愤写了《奇怪的挫败》(*Strange Defeat*)一书,分析这一幕悲剧最为深刻周至。"这本书的力量可以说完全来自作者能用一千多年的法国史说明当身之巨变"。[①]这真是卡尔(E. H. Carr)所谓"过去与现在对话"(the dialogue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的一个最生动而感人的实例。何况史学虽不能预言,但史学家却无法不时时刻刻以未来为念。多一分对过去的了解终可以使我们在判断将来的发展方面,多一分根据。荷兰著

---

① H. Stuart Hughes, *History as Art and as Science*, Harper and Row, New York, 1964, p.106.

名史家慧辛迦(Johan Huizinga)说得最好:“对于历史而言,问题永远是:‘向何处去?’”①

相应于我们上述的期待,今后中国史学的研究应该走那条路呢?这个问题当然很难具体回答,我们愿意从原则方面略加申说。

史料学派以整理史料、考证个别事实为主要工作,并又自觉地排斥“疏通”,因此他们根本不愿意接触中国文化的形态及其发展历程这样的大问题。史观学派与之相反,特别注重这一类的问题,然而他们在观念上却不幸已成为西方模式的俘虏;尤其极端者则通过西方的“一家之言”来安排中国的史料与事实。这不但限制了史学家寻求答案的范围,而且还严重地削弱了史学家提出新问题的能力。史料学派在理论上否定了史学,史观学派则在史学方面以借外债代替生产。其结果是殊途同归,大家都只能以史料来炫耀于世。近代中国的史学界竟形成一种史料丰富而史学贫乏的奇怪局面。我们今后的史学研究一方面要把上述的大问题悬为终极的目标,而另一方面则无论在理论、方法或观点上都要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我们深知这样的大问题不可能有最后的答案,但是大目标的确立可以使史学家认清他们的工作的方向和意义。开放的态度尤其重要;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希望逐渐得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论断。在探索的途程中,异说竞起的情况将是无法避免的,这正是学术进步的常态。史学永不可能完全定于一是,但在大关键上建立起共同的讨论基础则并非奢望。因为基于理性和证据的研究成果毕竟具有最后的说服力量。

3.7 史学研究中的比较与比附

对于中国文化的独特形态及其发展过程的探索,基本上蕴涵一种比较的观点。离开了比较,文化形态的问题是无从彰显出来的。我们

① J. Huizinga, “The Idea of History,” 收入 Fritz Stern,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页 293。

所谓比较是相对于其他文化系统来说的,如一般人所常提到的印度文化、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之类。英国的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所作的文化分类,在此也有参考的价值。汤氏史学之所以招致批评,主要不在于他所提倡的比较观点,而在于他企图从文化的比较中寻求发展的"通则"或"规律"。

不但其他文化的历史进程足供中国史学研究的比较参证,社会科学家(特别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通过社区研究(不限于初民社会)对文化所获得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启发作用。韦伯曾说人是悬挂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Webs of significance)中的一种动物。人类学家纪尔兹(Clifford Geertz)为之下一按语,说文化便正是这种"意义之网"。纪氏更指出,文化研究"并不是一门实验科学,因此不是要寻找其中的规律,而是要追问它所表现的意义"。[①]史学在性格上无疑地与社会学、人类学相近,而与实验科学相远。纪氏所特用的"解释"(interpretation)一词,其一部分涵义是和前面提到的中国史学上所谓"疏通"暗合的。不过史学所要追寻的并不单纯是一种静态的"意义之网",更重要的是文化在历史时间中的流变。

在过去几十年中,史学家之间并不乏在理论上肯定以至提倡这种观点的人。但是在实践中,比较却不幸流为比附。如孔子比附于苏格拉底,孟子比附于柏拉图,荀子比附于亚里斯多德。特别要提到的例子是梁启超广为影响的《清代学术概论》,正如史华慈所指出,这本书始终"贯彻和强调着欧洲文艺复兴和清代的比附"。[②] 这一类的比附虽不是完全无所见,但推衍过甚之后,反而使我们看不清中国史的本来面目。

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在文化接触的初期,比附作为一种比较方法,虽然绝不理想,但往往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佛教的"格义"便可以说明这一点。下迄4世纪,中国佛僧仍"以经中事数拟配

①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Basic Books, New York, 1973, p.5.

② 见 Benjamin I. Schwartz,"Foreword", Liang Ch'i-ch'ao, *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Ch'ing Period*, Emmanuel C. Y. Hsü 译,页 1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年。

外书,为生解之例"[①]。"外书"主要是指道家的哲学著作。换言之,印度的观念借助中国思想的相似术语而得到解释。等到中国佛僧完全把握到佛教理论的精微以后,发现这种"格义"之法"于理多违",才弃而不用。但是佛教所提供的一种比较观点,则从此在中国思想史上坚固地建立起来了。

目前中国史学中的西方影响也许还没有完全脱离佛教史上的"格义"阶段;我们对于比较观点的运用尚未达纯熟之境。然而回顾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历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方面的进步是存在的,虽则是比较迟缓的。假以时日,中国佛教自主成长的一天,终究是会在中国史学上实现的。我们正不必为以往一些不恰当的比附而沮丧,更不能因噎废食,要完全抛弃比较的观点。

历史哲学上有所谓"类比谬误"(fallacies of false analogy),恰是针对着比附或格义的流弊而发的。然而哲学家和史学家同时也都承认,作为沟通观念或说明事象的一种方法而言,类比在史学上仍不失具有多方面的功能。简单地说,类比不但是在异中求同,而且还在同中求异;史学家所经常援用的"比喻"(metaphor)便是类比的一种方式。比喻是取两种事物中相类似之一端互为说明,以加深了解。但局部之同无妨乎全体之异;而且即使在局部之同中也仍不免有细节之异。所以类比的运用如能在异同两方面都达到恰如其分的境地,则正是史学得以不断进步的基本保证。所以我们一方面肯定比较观点在今后中国史学研究上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则严格地要求史学家避免早期"格义"的笼统和粗糙。清代学术思想史决不能比附为西方的"文艺复兴",但是在局部发展的某些个别层面上,如作为信仰基础的考证学兴起,清代学者的确可以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相比较。先秦百家之学的兴起比附于古希腊的哲学发展虽值得怀疑,但是今天历史

---

① 释慧皎《高僧传·竺法雅传》,英译文引自 Fung Yu-lan,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Derk Bodde 译,卷 2,页 241—242,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 年。

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使用的“哲学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的观念则使我们在分析百家之学兴起的文化背景时,可以比较于古代希腊、以色列、印度的哲学发展而增加一重理解的方便。此外如“专制”、“封建”、“革命”、“阶级”、“社会流动”、“社会结构”之类中国史学著作中常见的概念,其经验的内容虽大多起源于西方,但如加以适当的限定,也同样可以应用于中国史的分析。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比兴》篇曾说:“物虽胡越,合则肝胆。”他又说:“故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刻鹄类鹜,则无所取焉。”[①] 刘勰在这里所讲的是中国文学上的“比”,然而我们却正好借来以表示我们关于史学上比较观点的基本态度。

3.8 中国史学的“中距程”进路

最后,必须说明,我们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形态及其发展的过程”的重要性,只是将此悬为今后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但是实践中,我们认定史学研究是一种具体而踏实的工作,其根基全在平时一点一滴的功力积累。没有功力或功力未至而希望在史学上立新说、创独见,古今中外皆无其例。六朝清谈最号玄虚,而颜之推却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②] 今天当然没有人能够观遍天下书了。但是相对于一己的研究题旨而言,每一个史学工作者首先便必须能够充分地掌握住基本史籍。否则真像王僧虔《诫子书》中所说的话:“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③] 没有功力而谈玄,尚且危险,更何况是“实事求是”的史学呢? 近代西方史学的突飞猛进决不能完全归功于

① 英译本见 Vincent Y. C. Shih 译, Liu Hsieh,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页 198,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年。

② 英译本见 Ssu-yü Teng 译, Yen Chih-tu'i, *Family Instructions for the Yen Clan*, 页 84, Leiden: E. J. Brill, 1968 年。

③ 见《南齐书》本传,百衲本,卷三三,页 10b—11a。麈尾常用于清谈。

新观点、新方法,其基本功力的长期积累更值得我们注意。从古代碑文的著录,档案的保存和整理,各种史籍和专集的编纂到无数的专题研究和学报论文,这些都是西方史学功力的具体表现。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一坚实基础的存在,新观点、新方法才能有施展的余地。

俗话说得好:"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我们认清了什么是现阶段中国史学的主要任务,这是所谓"大处着眼"。能从"大处着眼",我们自然不致重蹈史料学派的琐碎和盲目的覆辙。但是中心的目标并不能代替工作的程序。我们不能把"文化形态"、"发展过程"加以口号化,然后安插到每一篇史学论著中去。这是史观学派"以论代史"的旧陷阱。史学研究没有捷径可循。我们只有从"小处着手",各就性之所近和专门训练之所能,对中国史上具有关键性的各类大大小小的问题进行反复不断的分析与综合。分析与综合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在某一类或某一时代的问题分析到可以作初步综合的阶段,我们便尝试着去综合;在综合之际发现了新的空隙,我们又得重新从事分析的工作。不用说,在多数的情形下,历史问题的处理不可避免地要求史学工作者同时在不同的层次上运用分析与综合。但是问题或大或小,工作的性质或偏重分析或偏重综合,都和作品的价值没直接关系。史学作品的价值最后还是为它本身的学术品质所决定的。从研究工作之具体可行的观点说,与其规模过大而流为空疏,则毋宁范围较小而易见驾驭之功。求其中道而立,则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 Morton)的"中距程理论"(the middle-range theory)之说最足资史学工作者的借鉴。默氏因感于社会学上有些理论过于庞大,以致无从取得经验事实的印证,所以才特别提倡这样一个"中庸"之道。而他自己的研究业绩也充分说明这确是一条可以走得通的大路。史学也是经验科学的一种,默氏的建议完全可以适用。

一部中国史浩瀚无垠,它不是一个只可供少数逞才使气的英雄人物驰驱征服的疆场。只有许多实事求是的史学工作者长期而不断地默默耕耘,才能把这块大地化为一片肥沃的绿野。如果治史可以比作饮

水,那么我们不妨说,史学工作者只能企求学到李德裕那种品味的本领,分辨得出扬子江水有上下游的不同,而永远无法具备马祖禅师所说的神通,可以"一口吸尽西江水"。但是最有智慧的还是庄子的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①

这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的最高理想。让我们借用这句话来表示我们对于中国史学的展望!

(据"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in George Kao, ed., *The Translation of Things Past, Chines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82, pp.7—26 译出。)

① 英译见 Burton Watson,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 页32,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年。